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6月15日第11期 总第157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57期

###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三）

#### 目 录

##### 【专 稿】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三）

1. 从步行串联到煤矿串联
2. 革委会

##### 【访 谈】

杨东晓采访 戴为伟整理 谭保华口述：1966年12月受命抓彭德怀

##### 【述 往】

唐振权 拾珠串链：我的记忆碎片的整理（之二）

1. 老九，都需要上“五七干校”
2. 为什么大学都要迁出北京？

##### 【资 料】

戚本禹 与北京航空学院等校同志的谈话（1967.01.17）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通讯社 造反就是要夺权（1967.01.22）

中央首长关于朱成昭问题的指示（1967.01.23）

地质东方红 朱成昭及其同伙反动言行的第一批材料（1967.04.7）

朱成昭 我的检查与交待（1967.08.15）

##### 【读者来信】

1. 扬子浪提问/卜伟华解答
2. 黄肇炎谈丛立新《文革期间北师大的非正常死亡》一文
3. 蒋健纠《记忆》第156期之错
4. 孙怒涛赞乔晞华《文革暴力、真相与和解》一文

##### 【本刊声明】

【专稿】

##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三)

宋翔雁

在文革结束四十年的今天，冷静深思，不得不令人痛心地承认：地院“东方红”所代表的造反派群体，在这场革命中的作为，就其性质而言，也和江青在抗辩词中所坦诚道出的一样——“我就是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最终也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命运。

现在要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难堪的、痛苦的。因为，这岂不完全否定了我们当初满怀激情投入文革的初衷？但是，只有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方能从这场浩劫中完全并真正地解脱出来，从而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残存的文革因子，确保不会再次盲目跟进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文革式运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这也是我愿意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回顾自身在文革中的表现的重要原因。

——作者题记

### 一、从步行串联到煤矿串联

#### 1. 响应号召：“长征”——步行串联

在“东方红”的小将纷纷去外地串联，支持当地造反派的同时，从八月中旬至十月下旬的两个半月时间内，外地红卫兵也纷纷来京，接受毛主席在天安门的检阅达八次之多。

“八·一八”，毛主席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这既是对红卫兵小将造反精神的支持，更是对自己获有深厚群众拥戴的最好展示。从而既可进一步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响应他的号召，按他旨意起来造反；又可进一步敲打、震慑他的政敌，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接踵而来的一次又一次“检阅”，使北京不堪重负，加之即将进

入冬季，天气渐寒，南方北上的小将们衣单体弱已渐难支。同时铁路客运因小将们南来北往、东行西奔的无序串联，使正常客运几近瘫痪，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

这一不利的形势，考验着高层管理者们的智慧和能力。一方面，既要支持文革运动的继续深入，保护小将们对伟大领袖近乎疯狂的效忠之情（否则，在那个年代什么帽子都会给你戴上）；另一方面，又要妥善处理实际存在的无法继续“接见”的现实。应当承认，在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内，不乏具有大智慧和超强组织能力的高人。于是在十月下旬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从而使众小将乘车来京被接见的模式，一下变成小将们自己背负行囊步行去各个红色地区瞻仰，接受教育的步行串联模式了。

在步行串联的号召下，我系半工半读教研室在钱天宇、杜昌林牵头和倡议下，邀集了其他七位老师（计有许宪书、张润生、程银水、谭义贤、柯火炉和我）组成一支完全由教师参加的“东方红长征队”，准备从北京步行至韶山。在步行串联的起终点的决定上，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想法。我考虑，长征队里尽管有八人是第一批就参加了“东方红”的造反派，但绝大多数都属非“红五类”出身，要走向“唯成分论”称霸的外省，长征路程不宜过长。所以，我建议终点以兰考——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生活、战斗的地方为宜，这样用时也就两个月左右，而且距京较近，万一有意外或需要，联系和补救都较方便。

当时我内心还有一个想法没敢讲出来，怕被误解为自己以造反派自居，不愿接受教育（因当时我认为：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要在斗争中接受锻炼和考验，这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这也是我在近两年的“四清”运动中的切身体验）。但我没能说服大家，最后只好互相妥协：我以兰考为目的地，其他同志则以韶山为终点，大家从北京出发，经兰考再至韶山。在求得统一的过程中，虽然我认为去韶山多少有点“朝圣”的味道，从接受教育、改造自己的角度讲，有点牵强。但是，为了避免被误认为是对毛主席的大不敬，而变成政治问题（在个人崇拜鼎盛的时期，有这种思想顾虑的人十分普遍），我隐而未言。

到兰考的线路是：北京-固安-雄县-高阳-安新-保定-蠡县-安平-新河-巨鹿-曲周-内黄-濮阳-乐明-兰考。接下去就是奔向“红太阳”的出生地，因我不想前往，故接下来的路线

怎么走，我现在已经毫无印象了。

达成上述统一后，“东方红长征队”于1966年11月2日上午从北京出发。出发前还在探工系试验室前举行了一个简短仪式，宣誓、授旗（“东方红长征队”队旗），搞得有模有样，在教师层级上这样做，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

关于这支队伍和步行串联有以下几点值得记述：

（1）就我所知，这支教工组成的步行串联队在地院是唯一的（在北京高校中我也没有听说过有过类似的步行串联队伍）。成员的平均年龄约35岁，最大的四十出头，最小的近三十岁。每天背负行囊步行35~40公里，有时还会更多一些（在某些接待点如老根据地要采访或参观时则需停留）。总里程达到一千七百余公里和七百余公里。特别是进入12月后已是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对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确是一种意志和信念的考验。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这些同志想在文革中按接班人五项条件锤炼自己的真诚心愿。

（2）在人员组成上，我们也按“东方红”吸收人员的原则，不拒绝诚心要求改造自己的同志参加。所以长征队中有一位尚未“解放”的干部许宪书同志。他是一位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十七级干部，一九五六年时响应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重新报考大学进入地质学院探工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文革前任探工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一开始，他在半工半读工地就被学生们揪斗（因他是半工半读现场教学、实习的负责人），回校后就一直被挂着，说要审查他的历史问题。但事实上他的问题却无人问津，他只能规规矩矩每天按时到教研室参加会议、学习文件，对大家的争论、来自社会上的“小道消息”很少发表看法，处事十分谨慎。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好同志，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平时他和大家在一起，没有任何架子，不像自以为高人一头的年轻党员。所以我和他相处很随便，没有任何拘束感。此外，他为人老实而且诚恳，对我这样出身有问题又心直口快的一般群众，时不时的还给予必要的善意提醒，这对当时的干部而言，是难能可贵的。记得我刚从“四清”回到学校与他在宿舍聊天时，他就曾告诫过我：“要小心炮打将军隔一家，现在形势是很复杂的”。他毕竟有相当阅历，了解政治和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所以才

这样提醒我，体现了爱护关心年轻人的品格。他的这一告诫给我极深的印象。

想不到22年后，在“六四”前夕，我也用“炮打将军隔一家”的同样教诲，告诫我单位（因两地分居，我于1985年底从武汉地质学院调至中国地质矿产信息研究院）方法室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同志们，要求他们这段时间谁也不许去天安门“看热闹”，抓紧完成各业务组长交给的任务，上下班需经过天安门的可以在家工作，但每天需来电话汇报工作进度，公用电话费留下单据交室里报销。没想到我的善意劝告和行政要求起到了作用，“六四”后，在上级要求下，各单位每个人都要“反思”并表态，在全院22个处室中，唯有我们方法室的年轻人没有一人上街，也没有一人去过天安门，从而他们很轻松的就从“六四”后的审查中过关了。许宪书是长征队中年岁最大的，当时约已四十一二岁了，但他一直跟随大伙儿步行到韶山，很不容易。

（3）离京后，我们经河北固安、雄县到达保定。我们接受了当地少数派的邀请，与他们举行过一次座谈会，听取了他们受到保定市和多数派打压的一些情况。但我们出发前就有思想准备，长征中我们主要是接受教育，加强对自身的改造，对各地的两派争斗不要轻易表态。因此，在座谈中我们虽强调要有造反精神，但反复叮嘱一定要按《十六条》办事。尽管如此，这次座谈还是引起对立一方的警觉和不满。

当晚我们正在讨论次日的行程时，突然闯入许多人，将我们几个参加过座谈的同志连推带拽地拖出室外，令我们交代到保定来的目的和参加对立派座谈会的用意。我一看当时的架势，操场上黑压压的一片（接待站设在一座学校里），估摸着得有数百人之众，而且气势汹汹，很多人还手持棍棒、农具等家什，看来来者不善。因事发突然，没有时间商量对策，但也不允许我们犹疑不决。这时要做的就是勇敢、坦然而又冷静地面对。要直言不讳地宣传，我们步行串联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革命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宗旨；亮明身份，我们是地院“东方红”的成员、是革命教师（因当时就有人怒吼着：他们不是红卫兵小将）；注意讲话技巧和用词，避免刺激性语言，以免激化矛盾引起正面冲突；注意斗争策略，讲话时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要尽力回避，学会外交语言，绝不可授人以柄陷自己

于被动。当我大致想清楚这些原则后，就自告奋勇地向队长钱天宇表示：我先上去讲（在一张桌子上）。因我在农村锻炼过近两年，了解农村用语和农民的特点。保定尽管是河北省一个较大的城市，但来者多数是农民，起码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同样也不是学生娃。

当我走上“讲台”后，我就按自己的思路，用尽量通俗且农民习惯的语言讲述了我们长征队的宗旨、背景和成员，大力宣讲了《十六条》，阐明毛主席号召广大群众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警惕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开始讲时，还有一些群众气势汹汹很不友善地喊口号，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家就平静下来注意听我讲的话了。特别是当我讲到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身体很好，号召我们“红军不怕远征难”进行步行串联时，大家还给以掌声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予以呼应。最后，他们一个领头的还和我握握手，说：对不起，误会了！

就这样，我们总算度过了一次“危机”。事隔46年后，长征队在京的五位同志来我家里聚会，政委杜昌林同志还特意翘着大拇指对我当时的勇气和表现赞叹有加。当然，这只是大伙儿一笑而已，都已经七老八十了，不可当真。

（4）在奔赴兰考的行程中，我们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很有影响的地区都作了一定时间的停留，听老人讲解或采访他们，了解当时的斗争情况，参观当地的展览或实地考察等。如蠡县——三十年代初的“高蠡暴动”就发生在这里；白洋淀地区的抗日斗争；在解放战争发生前“军调处”美军在安平县发生的安平事件；内黄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这些活动，我们都觉得获益匪浅，内心产生很大的震动，觉得似乎把我们也带回到当时血与火的惨烈斗争环境中。至今我还认为，能到“实景”地观看并走访一些当事人或听亲历者讲述，远比在礼堂里听报告，或在专门的展室里参观，所产生的心理震动要大得多。比如，在内黄，我们亲眼看到掩埋同胞尸体的巨大万人坑和坑内的白骨。面对这惨不忍睹的情景，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的认识就不仅是报告里的言辞和文章内的数字，它已然是一幅有血有肉的画卷，牢牢地刻印在我们的心中。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内黄人民的崇敬！

(5) 兰考，不仅是我个人此次步行串联的终点，也是我们整个长征队的一个重要造访地。因为，在文革前发表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成为每个有志青年的学习榜样。当文章发表时，我正在农村搞“四清”，对这位书记的事迹感触极深。因为近两年的农村生活，让我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活太清苦了，而他们的劳动又太艰难了。反映前者的是一幅至今让我难以忘怀的画面：一次在老家吃饭（那时叫“派饭”——指工作队的成员单个轮流到各家但不包括“四类分子”家吃饭），他们给我包的饺子（当然不是现在的大肉或海鲜，就是一般的蔬菜饺子，但却是白面的。须知，白面，老乡们只能在大年夜才能享用呢）。为了打两分钱的醋，还得让她的孩子捡个鸡蛋，到两里地外的合作社去换。孩子回家后，再把大约半瓶醋和余下的几分钱交给他妈。我问孩子他妈，得知一个鸡蛋视大小在合作社只值三五分钱。老乡的这种生活和他们对我的感人情怀怎么可能忘记呢？！反映后者的是他们长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场景。所以，我对这样的书记内心就有一种崇敬感，很想利用步行串联的机会，去看看焦裕禄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从中接受革命教育，坚定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在兰考，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办公室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摆设，也看到了那把陪伴他克服、减轻肝癌疼痛煎熬的藤椅上留下的窟窿。在为纪念他而建造的塑像前，我们留影并内心发誓：立志学习焦裕禄的革命品德，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还走访了他带领大家治沙种桐（泡桐）的现场，当时的泡桐林还处于初始阶段，只是刚现雏形而已。同时，我们还走访了几位与书记一起查风沙走向和种泡桐固沙的乡亲。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我们好像真的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革命洗礼，坚定了人生的信念。

如今我虽已退休多年，年近耄耋。但我坚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做一个真正的人需要有信念、有榜样、有追求！

长征队在兰考大约停留了三到四天，约在六七年元旦前后，队伍就一分为二分开行动了。我完成了预定的任务，送别大队其他同志继续上路后，就乘火车返回北京了。尽管当时已经不再是乘车串联的高峰期，但火车上仍很难找到座位，几乎是一直站到北京的。



## 2. 震惊与不解——朱、蒋、杨走向反面

回校后稍事整理，很快就回到教研室继续参加运动，并在学习讨论中，应领导小组的要求，向大伙简单介绍了我们步行至兰考这段路上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受与收获。对我们能走出去接受教育，经受锻炼，很多同事还是赞赏的，但也有人冷冷地说：你们这一走倒是把老许头（指许宪书同志）给保起来了！对此我也不客气地回敬道：人家主动要求接受教育、经受锻炼有什么不好？再说，每天他要走七十八里路，可是实实在在的，这对他也并非易事！在那个年代，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蛊惑，一些人在心理上总愿看到有人被批、有人被整，好像只有这样的生活才充实、才有意义。

从教研室的活动中给我的感觉是，学校的运动进程似乎有点停滞，这可能与很多小将外出串联有关。后来我去学九楼作战部办公室找金希华老师想问问情况，他只说现在很多学生都出去了，有事时连人都找不到。他只倒自己的“苦水”，竟没有对我说任何情况（也可能他确实不知道更多的情况）。后来在办公室遇到几个也来问事的动态组的学生，其中一个也是水文系62届的邱培信同学。他见到我后就把我拉出了办公室，不由分说地说：走，告诉你点情况！我们一直走到学九楼大字报栏南边的桃源深处他才停下来，他告诉我“东方红”恐怕要出大事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他：你没头没脑地说什么呢？他并未回答我的问题，又问我：你认识叶向真吗？我说：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刘诗昆的媳妇，叶剑英的女儿。这时他才平静下来说：现在叶向真老来找朱成昭，给他灌了很多上边的事，把朱成昭给搞糊涂了！他对中央文革意见很大，听说还想给中央文革贴大字报呢！我问他：确实吗？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跟他很紧的同学传出来的，肯定有这么回事！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担心要出大事，心里非常着急！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这段话时，眼睛红红的，泪水都快出来了，一个老“东方红”战士对前程的忧心，让我分外感动。当我再问他朱成昭具体有哪些意见时，他说：更具体的事，我就不清楚了。接下来我又问他：蒋良朴、王大宾他们知道吗？他说：不清楚。因为当时我对中央文革是百分之百地信任的，所

以我建议他去找蒋良朴、王大宾等核心组的成员，反映你们下边同学的担心，请他们注意这一动向。一定要帮朱成昭转过来，别给别人当枪使，毁了自己，毁了“东方红”。分手前，他也叮嘱我别在老师中传这件事，否则一旦有人把这事捅上去就麻烦了！

事后，我没有向校内的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但周末回家时，我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姐姐（她解放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五十年代初就加入了共产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留校与浦安修一起工作，关系密切）。因“东方红”成立之初，她曾来学校看我，并让我陪她去“东方红”在教四楼的总部造访。她在接待部谈了很久，但具体说了些什么并未和我讲过，只是说：你们那个姓朱的负责人很有头脑、很有魄力，是个人才。当时，从她所说的话看，她见到过朱成昭，并与之交谈过。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所以我才把这一情况告诉她。她听后直摇头说：可惜了，还是年轻，未经世事。政治斗争哪像你们想的那样简单！还特别嘱咐我：你千万别去打听，要注意听，注意观察。这事不发生最好，万一挡不住，你千万别头脑发热随便表态。听中央文革的，暂时想不通的，就先别说！

大约一月底的某日晚上，总部（不记得具体人是谁了）让我随他们一起去车库上车进城，但始终没有向我说去哪儿、干什么？我只记得连我一共五个人（不算司机），正好乘一辆嘎斯 69 吉普车。在车上只听见领头的跟司机说去平安里解放军报社。沿途大伙儿没有一个人说话，气氛异常沉闷。但因是夜晚，沿途几乎无人无车，我们很快就到了解放军报社。汽车停在报社北门对面的公交车站处（那时还是 331 路公共汽车的总站）。下车后，我们穿过马路来到报社门口，我隐约地听到领头的与门卫说：我们是地院“东方红”的，找肖力同志。门卫回过身向传达室里边的人打了个招呼，让他打电话通知肖力。时间不长，只见一位身穿棉军大衣，戴眼镜，身材较高的女军人向我们走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肖力，此前只听学生们说过肖力同志常来地院，是支持我们的），见面后她主动与每个人都握握手。和我握手时还说：我们以前好像没见过吧？我点头说：对！同时通报了姓名。这时领头的对肖力说：他是探工系的老师，是第一批“东方红”的成员。

见面后，肖力示意我们到马路对面去，可能是因报社门口灯光太亮，还有站岗的，大

伙儿站在那不大方便吧。过马路后我们往东边走了一段路，停在一辆331路公交车旁边，车身正好挡住路灯的光线，显得稍暗一些，我们在哪就不太显眼了。站定后，大家围成了一圈，肖力开门见山，问领头的：朱成昭现在的情况怎样？领头的汇报说：陈伯达同志的批示给他看过后，我们已和他谈过两次，表达了大家焦急的心情，希望他能很好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作出检查并彻底改正，继续和大伙儿一起战斗。这两次谈话他不像刚得知陈伯达批示时情绪那样激烈，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相反，谈话时他的情绪都很平静，第一次谈话后，他表示让他再好好想想；第二次谈话后，他表示同意检查，并希望给他几天时间。听后，肖力表态说：这样就好。但你们还要继续做工作，坚决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争取他能转变！说到此，肖力话锋一转继续说道（此时肖力的头也转向大伙儿了）：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已经半年多了，但北京市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工人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在这方面上海走在了北京的前头。回去后，你们也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学生要到工人群众中去，要与工人群众很好结合才行！

最后，肖力说：天很冷，今天就这样吧。有问题以后再联系。说毕，我们大伙儿一起回头沿马路向西走，而她还在与头儿边走边说些什么。快到解放军报社大门对面时，她停下来和大伙儿告别，然后斜穿马路进入解放军报社。等她进入报社后，我们才继续往西走了一小段路，上车后，头儿说：今晚回校后就先休息了，下一步怎么办，明天研究后再定。

对我来说，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是很突然的，至今想来也觉得很奇怪。一来我不清楚总部为何要带我去找肖力汇报朱成昭的事，因为事前“官方”没有任何一个人与我讲过朱成昭的问题，更没有讲过陈伯达同志有指示让朱成昭作检查；二来我从未见过肖力，也从未听总部的头头向我说起过肖力其人和她与“东方红”的关系；其三，“东方红”成立后，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被人认为是“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领导眼中我属于可用而又不能重用的人物，口碑不算很好。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尽量与“东方红”的头头们（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过分去接近他们，更不要向他们表示或要求什么。以免让反对者借我的所谓“有问题”去抓他们的辫子，而影响大局。

运动以来，我恪守着对自己的约束，始终按自己的看法参与运动，以备今后自负其责，不致影响他人。正因为觉得突然和奇怪，再加上当时去解放军报社的其他四人都是学生，此前和事后似乎与他们交往得也不很多，在整我“五·一六”被关押近两年的时间内，对此事和接下来发生的总部让我单独去作朱成昭工作一事，我都绝口不言，始终未向专案组作“交代”，以免波及他人并陷自己于被动。

次日下午（或再一天下午），带我去解放军报社的那位头头在学九楼三层东边一间朝北的房间里对我说：宋老师，关于朱成昭的事，总部研究后想请你去和他再谈谈。好好劝劝他，让他冷静下来，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同时告诉他总部所有的人和广大造反派战友们的心情是：希望他能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很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想法，尽快做出深刻的检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一定要让他明白，陈伯达的批示尽管严厉，但这是出于对他的爱护，千万不要有情绪。中央文革是爱之深才责之严的！告诉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中央文革要求我们下厂、下矿发动工人群众起来闹革命，向工人群众学习。听后，我对他说：我与朱成昭从未单独说过什么，他能听我的吗？他回答道：你别担心，他知道你。而且这些天来我们也找一些平时与他沟通不多的造反派老人去劝他、帮他，因为总是我们几个人和他谈，他也会腻的，反而听不进去！宋老师，你就放心去吧，我们已经告诉他了，他没意见！最后，我答应他，表示一定尽力而为。我走之前，他又嘱咐道：最好能请他定一下检查的时间，尽量早点为好。同时又加上一句：去解放军报社的事就不要提了。

我赶往西三楼三层朱成昭的住地（在三层东头一间朝南的房间）。一路上我就反复琢磨谈话如何开始为好；如果开不好头，话也就很难谈下去，总部托办的事也就难以完成。但我既不太了解他的个性，又不太了解他犯错误的具体情况。只笼统地知道他犯了反对中央文革的严重错误，性格上比较自负。越想越觉得这事比较棘手，眼看就到西三楼了，心里还是没能捋出个头绪，但不能再瞎想了。

最终，我决定以自己的感受做引线，以对“东方红”的期盼入手，打感情牌，希望能有所成效。这样，我内心就少许平静了一点。待敲门进屋后，我先向朱成昭简单介绍了自

己的姓名和单位。他倒是挺客气的站起来说他知道，并请我坐下说。坐下后，我就开门见山实话实说地对他讲道：总部×××让我来看看你聊一聊，但过去我们之间从没有单独接触过，而且，对你这一段的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内心也有些顾虑，不知如何谈才好。可能因我的表白极其坦诚的缘故，他竟笑出声来，并说：宋老师，你别客气，也甭担心，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没想到开场竟如此顺利，身上的重负似乎也一下放下了，觉得起码我能按自己的设想把想说的话说完，他不至于因心烦或被触怒而中途“送客”。

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主要是我讲，他偶尔插问一下他想了解的事。如当我讲到因我知道自己的出身不好比较复杂，怕因此给“东方红”的头头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让老保抓辫子，所以我尽可能注意与你们保持点距离时，他问：“怎么个复杂法？”我只好简单地说一下我父母的历史。聊天中，我主要谈了个人和我知道的“东方红”小将们的一些感受，希望能唤起他往日的情怀，作出检查，幡然悔过。

(1) 从个人角度，我讲述了自己始终抱着跟党走，好好改造自己，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心愿回校参加文革。但因对工作组开始的做法有不同的想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就在“反干扰”中被打成反革命，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精神压力极大，想到未来，前景暗淡。这时，如果没有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没有中央文革的指点和支持，没有“东方红”小将们的奋力抗争，这个案是不可能翻转过来的。虽然，在这一翻案的过程中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他们终归离老百姓很远，我能切身感受到的，就是“东方红”小将们对我的态度和鼓励，让我第一批就参加了“东方红”，成为地院造反组织的一员。我珍惜这一切，希望“东方红”的成员，特别是领导成员，能团结一心，继续带领大家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建功立业，继续前进。

(2) 从我了解的小将们的角度，我讲述了邱培信同学和我讲的情况，但我有所取舍，不想触动他的自尊心，而着重于大家对“东方红”前程的担忧。我说：也是你们水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邱培信（这时他插话说他认识），前些日子，我刚步行串联后从兰考回校，在学九楼作战部办公室遇到他。他拉我去桃园，急切地对我说：“东方红”怕要出大事了，

朱成昭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陈伯达让你做检查。现在很多同学都在议论，担心会出大事，心里非常着急。同时我特别强调地说道：他说这段话时，双眼红红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些老东方红战士对公社前程的焦虑之情，真是令人感动啊！

在我说后面这段话时，他没有再插话，头低着，手将一支未抽完的烟碾得粉碎。看得出他内心也是波澜起伏的。我觉得，他对和他一起战斗过来的伙伴们，还是很难割舍的。

至此，我觉得应当见好就收。就说：朱成昭同学，我今天想谈的就是这些，也是我和关心你的小将们内心情感的真实反映。我们大家真诚希望你丢掉包袱向前看，勇敢承认自己的过错，及时作出检查，继续带领大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尽管听说陈伯达对你的批评很严厉，但我和大伙儿一样觉得，爱之深，才会责之严呢！对此，你千万不要带着情绪去想，人犯错误难免也不可怕，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何况你是一个有思想、有魄力的革命小将呢！我还要感谢你耐心听我讲了这么长的时间，供你参考吧。最后我也转告他了，×××希望他能尽快定一个检查的时间，以便能及时安排。

最后，当我告辞准备离去时，朱成昭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很诚恳地说了两声谢谢，并说检查时间他会很快告诉×××的。

离开后，我如释重负，但我内心却没有朱成昭能接受规劝的把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凡能成事者，都是极具主见的人，岂能为说客的感情牌所打动呢？而且，规劝过程中，我观察着他住室内的状况，空酒瓶桌上、窗台上凌乱的摆放着，烟蒂满地，油印的小报散落各处，床铺也很零乱，一付失意、颓废之相。一点也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样子。这和过去他在集会上给我的印象——坚定、意气风发——截然不同。

回到学九楼，我将劝导的情况向×××作了汇报，他觉得挺好，并说：那就等他的时间吧，希望能有好转。

现在回想起来，当朱成昭的问题暴露并遭到陈伯达的严厉批评后，总部核心组的成员确实按中央文革的指示与朱成昭谈过，并力图让其很好检查、承认错误后再回到领导岗位。为此还经常向肖力等通天人物汇报进展情况，争取得到更多的指导。同时，为了能让朱成

昭接受劝导，也的确煞费苦心地找个别老“东方红”的成员与他谈心，争取他的转化，其中我也是这类对象之一。但从让我去做工作的过程可以看出，核心组在如何做好转化工作上，研究得不够细致，针对性不强，收效不高。当然，这也与时间紧迫、核心组面临的压力过大有关。何况，转化工作成功与否，主要的还在内因。

### 3. 到工人群众中去——赴京西煤矿串联

大约一九六七年春节刚过，按总部的要求，我们探工系的师生由71631班的吴××带队（地院革委会成立后，吴某任探工系革委会主任），奔赴北京门头沟的京西煤矿的门矿、王平村矿、木城涧矿、长田矿（属房山县），这大约就是为了落实肖力同志一月底在解放军报社会面时所作的下厂、下矿指示——发动工人群众起来造反而采取的行动。当时领队给我的任务是留驻矿务局广播台（我们一到门头沟矿务局，吴××就立即向矿务局党委宣布：我们是奉中央文革的指示进驻京西矿务局的，任务是发动广大工人群众积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揭发、批判矿务局党委和北京旧市委的黑关系，揭发批判矿务局党委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要求他们立即交出广播台的钥匙，同时责成我带人去接收），负责宣传、播音工作。我们总共有七八个人，只有我是一个是老师。除我外，在广播台的还有两人，一人负责机务，另一人是女性，负责节目编排，播音则大伙儿轮流担当。其他几人则分别下到各个矿山，提供素材或稿件，负责报道所在矿山的运动进展情况。

说句老实话，吴某当时对矿务局党委所做的宣布以及分派给我的任务，我内心丝毫没有任何不妥的感觉。在当时“地质东方红”在京和全国红得发紫的大气候下，我甚至还觉得小将们做事很有气魄和胆略。而对我的信任和重用，内心除觉得很兴奋外，倒是还有点自知之明，觉得应更好地工作，加强锻炼和改造自己，不要辜负大家的信任。我能把兴奋和责任联系在一起，说明自己尚未到忘乎所以的地步；后来每每想起，也只有这一点是自己京西一行中值得肯定的。但后来随着文革中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造反派唯我独革的气势越发张扬，慢慢自己也开始产生一些不再完全盲目紧跟的想法。这时，自己才初步觉得

这种做法与地质部工作组刚进地院时如出一辙，毫无二致！当真有这么一点粗浅认识的时候，我们已经早就离开京西矿务局，回到学校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京西矿务局，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听到任何当地干部和工人对我们在京西作为的评价，但我心底里是明白的：他们不会给予任何正面评价的！

在京西，很快我们自己也变成了文革初期进驻高校的工作组。因为我成天在矿务局广播站处理稿件，从事播音工作，很少到基层各矿井去，所以对下边的同志们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工作知之甚少。但起码从上来的稿件和材料中可以看到，下边发动群众的工作，主要停留在召集工人群众开座谈会，向他们介绍北京和外地工人起来揭批领导问题，甚至夺权、罢官等一般情况上。对矿山的建设和发展、对当前矿山的生产、安全，对各矿山领导班子的基本状况等重要问题，基本上没有反映。由于我们的到来，打着支持造反派的旗号，使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越加尖锐，一派群众随即将矛头指向小将，终于在京西矿务局所在地的门头沟矿出现了轰赶“地质东方红”的标语和大字报。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反应就是要坚决迅速地给予反击，支持造反派群众、支持革命小将。于是，我立即赶写一篇回击这股轰赶“逆流”的文章。由于情绪异常亢奋，文章几近一气呵成。文章的具体内容现在已毫无印象了，无非是大讲“地质东方红”的成长历史，自我表彰一番，并警告“轰派”群众认清形势，指出对待革命小将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奉劝他们及早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题目至今还有点印象，可能是《岂怕一个斗大的“滚”字》。

让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上述文章在当晚播出后，听到广播的门矿工人群众竟误认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这时，“轰派”的群众一下就“傻眼”了，相反，造反派的工人群众则兴奋异常。但双方都没有仔细去辨别，而是将误传一个个绘声绘色地继续传下去，搞得众人皆知，认为“地质东方红”小将在门矿的行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所以“轰派”的驱赶行动随之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第二天一早，门矿点的负责人蔡文芳同学（7161级的）就跑来矿务局，找到我们告知了一切，感谢我们的声援和支持。并极力夸奖文章写得好，请我们将稿件给她，以便抄成



大字报贴出去，好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无论是误传带来的意外效果，还是小将们对我工作的赞誉，在这次下厂下矿的行动中也只是小小的花絮而已，真正从受到教育和锻炼来说，则远不如步行串联了。

这里附带说一下蔡文芳同学。她是探工六六届的女生，后分配到冶金地质局（在天津），很有才华和组织能力，在引导冶金地质局探矿队伍转向工程市场上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受到了探矿界前辈们的积极肯定。她待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却少了一点警觉性，致使在九十年代后期，被其同单位职工的孩子为劫财所杀害。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下到矿山与工人师傅直接接触的机会，宣传推广工作已忙得不可开交。即使随下矿核心组去基层，也只是一两次（如去木城涧矿），而且主要是听取在矿上的负责人汇报情况，同样没有机会接触广大工人群众。因此，“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东方红”的小将们而言，其实只是一块遮羞布——为我们自身去厂矿鼓动工人群众造反，为文化大革命进一步造势遮羞而已。但当时的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反而觉得作为一名造反战士，能战斗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剩余的只有内心的激情和兴奋，不论多忙、不论睡得多晚，人的精气神总是处于亢奋之中。与工人结合、改造自己等就自然地被努力工作、尽职尽责所代替了。

我们在京西煤矿的串联大约到四月中下旬就匆忙结束了，原因我不太清楚，可能与院革委会的成立有关吧。京西煤矿所在地区就是北京西边门头沟和房山县地区，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武装积极活动的地区。建国后，京西煤矿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因受资源条件的限制，其产值和规模当然无法与其他大型煤企相比。虽如此，但该矿在六十年代初也曾发生过轰动全国的“挽救六十六名阶级弟兄生命”的矿难奇迹。面对有如此丰厚的革命史资源的大地，我们却未能很好地发掘和利用，作为充实自身的营养。相反，却成为一群革命造反的鼓噪者，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还自诩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如今想来真是愧对京西那片热土，愧对当地为革命和建设都做出很大贡献的人民群众！

## 二、革委会

### 1. 接受中央首长召见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初，我曾两次被总部召唤，随王大宾等人一起去人大会堂接受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的召见。这两次都是通过学校的广播喇叭直接呼叫找人，说有紧急任务，让我和我系的陆炎德老师去车库集合。由此可以判断这两次出行都是临时决定的，但由谁决定、为何会让我参加，我自己同样也并不知道。当我赶赴车库后，除见到陆炎德外，还看到王大宾也在场，另外还有四五名同学。大宾看我赶到后就让我立即上车，并在车上对我说是去大会堂参加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召见，并让我注意做好首长讲话的记录。但大宾对这次召见的原因和有哪些单位被召见都未作任何说明，事后我估计当时他也并不清楚，通知他参加会议的人员也未向他透露任何信息。

我们很快就到达大会堂的北门广场，下车后在北门由工作人员将我们领入大会堂接见大厅。同时也有其他被召见的人员由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进会场，但他们究竟是哪个院校的代表，我都不清楚。我们在会场等了不长时间，就看到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成员依次陆续进入会场并在前排主讲位置就坐。首长都落座后，就见总理向左侧的工作人员询问人员是否都到齐了，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总理就面向大家宣布开会。

总理和中央文革各位首长在这两次召见中的具体讲话内容，今天我已难以再回忆复述了，但两次召见留下的总体印象还是比较清晰的。这就是：（1）这两次召见会上的讲话和会场气氛都比较严肃，不像过去接见中对小将们的活动肯定和赞赏那么多。（2）整个讲话的基调是批评性的，让会议参与者感到有些压力。批评涉及的主要方面是指小将们不大注意运动的大方向，而只顾打派仗了。

会议结束已是次日凌晨，回到学校后，大宾让大家先回去休息，天明后再研究怎样传达。我的印象是，大会传达定于下午在大饭厅举行，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宾在看过相

关记录后，决定让我进行传达。我表示是否由其他同志传达更合适，但大宾不考虑我的意见，严肃地说道：就由你来传达，我会在旁边给你补充。看到这种态度，我感到他可能对我的过多考虑不满，就不再坚持了。事后我借了其他几个人的记录回去查对和整理，因时间很紧，根本来不及整理出完整的传达稿，只能在我的记录基础上，作必要的补充和修正。所以在传达前，我再次请示大宾：因来不及整出传达稿让核心组审查，能否在传达后告诉大家，大会传达后，再将召见会讲话内容整理打印后发给各单位。对此建议大宾表示同意。

当天的大会传达由大宾主持，他信守自己的承诺，在我传达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我的身边，极为专注地听着我传达的内容，几乎很少打断我的传达过程。他的这种信任，对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持，令我内心充满了感激。

在整个传达过程中，我忠实履行了传达者的职责，除了严格“照本宣科”（记录本）外，也把我在召见过程中所感到的氛围和印象通过自己的语音、语调带给了大家，因此使整个传达过程也显得相当严肃，让大家有一种受批而非受捧的感觉。可能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整个传达过程中，广大师生听得也很专注，基本没有被掌声打断过，直到传达完毕，才给以些许掌声。对此，我理解这仅仅是表达对传达者辛劳的感谢吧。所以当我回到学九楼简报组后，动态组的郑文卿和胡乐成对我开玩笑地说：传达首长讲话，怎么连掌声都没有得到多少，真是苦命！对他们的所言，我也只能报之一笑。

## 2. 在革委会简报组

我们从京西矿务局撤回学校后，我即被安排在院革委会简报组工作。当时是谁找我谈的，为什么让我去？现在我已毫无印象。说句老实话，自“东方红公社”掌权后，对来自领导安排的事，我的一贯态度就是努力尽职去做，并争取做好。对安排工作的细节、谁的意见等，基本上我都不打听。再说，当时领导布置个工作，也远非现在这样有一定的工作程式，随意性的安排、设想也是很普遍的，因此即使打听，布置者可能也难讲其详。

我只记得对简报工作的几点要求大致是：（1）简报内容以文革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和动

向、社会反响为主，与此前的动态报相似，但应进行很好的梳理，更简练、更突出。重点在报道而非述评、分析。（2）发放范围，除送院革委会成员外，还要求报送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3）组成人员没有给我规定，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根据需要可以由我自己决定。但却指定了一名打字员（是原党委办公室的一名机要打字员，女性，年岁比较大，估计近50岁，姓名已记不清了）和一名简报递送人员（一位李姓男同志，年龄也较大，约50岁左右，也是原院党委办公室的机要员）。并告知我，当简报编好即可直接交给打字员打印。打印毕再返还由我校对，待校对后再送到她那，由她负责印刷、装订，再叫老李负责外送和分发。（4）简报所需素材由动态组负责提供，但同时告我也可依靠石油教研室的郑××等人，说他们过去也给动态报提供素材，他们整的材料可作为简报资料的来源之一（5）简报出版时限一周1~2期，若有特殊事件须报，则中间可以加刊。简报组办公室就设在学九楼原动态组的一间房子内（在作战组办公室斜对面）。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根据我的印象，当时向我谈成立简报组一事时，并未言明任命我作简报组组长，也未明确今后谁任组长。但自谈话后，至最后我离开简报组（实际上也是简报组自行消亡）时，革委会也从未任命或指定过简报组组长人选。但军宣队进驻后开始整肃造反派时，为防止伤及无辜，在我写的交待材料中，我自认自己是简报组的实际负责人。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出于实事求是的处世原则。因为在简报组存在期间所发送的简报，尽管简报刊出总量我早记不清了，但有关简报内容的选材、编纂、定稿和校对等，可以说几乎全部是由我一人完成的。因此，我自诩为简报组负责人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并无夸张之嫌。譬如，石油教研室郑××曾就简报内容向我提出过比较尖锐的意见。他说：目前的简报内容比较一般，缺少深度和对动向方面的分析，对领导的参考意义不大。对于他提出的意见，我知道是源于简报中曾在使用他们提供的素材时，对他们提出的一些看法和分析，我基本上均略去了的缘故。所以我只好向他解释说：你说的意见确实存在，但这是革委会领导在成立简报组时明确要求的“重点在报道，而非分析和述评”。而且，我也觉得这一要求是实事求是的。因为现在发生的事件很多也很杂，要弄清事实并作出恰当的、

有深度的分析和述评绝非易事。若某件事确需查明真相、做出分析和评论，可能需要专门组织人力，做更多细致的工作方有可能，单纯依靠简报组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在简报组内工作时，是敢于也可以做主的。但我的这种担当也是有分寸的，并非一览无余地全都承接下来。如当军宣队整我、批我时，探工系的军宣队负责人之一（二把手，姓名已忘）就我交代的简报组材料（指我说自己是简报组实际负责人）批我“避重就轻、躲躲闪闪”，并拍桌子吼道：你的态度极不老实。对他们这种以势压人的恶劣作风，我很平静地说道：我写的材料是实事求是的，确实我没有接到或看到院革委会对简报组负责人的任命通知，所以我说没有正式任命。若为此说我避重就轻，那只好请你们从革委会找出任命档案来加以证实了。面对我的驳斥他无言以对，只好不了了之。

我在简报组的工作大约维持到八月底或九月初，实际上此前简报工作就已经难以为继了。主要是编写简报所需的情报资料的提供渠道日益不畅，动态组也因“人荒”运转失灵，很多原来定点跑材料的不见踪影，有需求时找不到人是经常现象。想要简报组正常工作，实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绝无可能。我个人觉得这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

（1）文革运动开展已一年有余，长时间的群众运动已让人们有些累了，缺少新的刺激感。再加上相当一部分人对运动的发展走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尽管还说不出什么道道。总之，群众不再像运动初期那样充满激情，中央文革指向哪儿，小将们就冲向哪儿。

（2）由于《东方红公社》内部的分裂，朱成昭被捕，蒋良朴、杨雨中及一些朱成昭的坚定追随者们被隔离审查，革委会内部也因反右倾而出现裂痕。以致广大造反派心目中的领导核心，已不再像造反起家时那样具有权威性。同时，广大群众的团结也如同核心领导层一样不复存在了，只不过没有出现两个不同的组织罢了。基于此，院内群众的涣散性开始滋生、蔓延，逍遥派日益增多，关心运动进展并积极投入运动的人群，反而日趋减少了。面对这一难以由我个人逆转的态势，我不得不向革委会的领导（具体找的是办公室还是宣传口的负责人已记不起来了）说明简报组的实际情况，建议暂停简报的编写和发送工作，视今后的需要与否，再定是否恢复。大约到九月上旬末，革委会领导就正式通知我，同意

我的建议，暂停简报组的工作，并让我通知负责打字和递送的员工回原单位参加运动。据此，我通知了负责打印的女同志和老李，并感谢他们前段的辛劳。与此同时，我自己也收拾了东西和房间，并把房门钥匙交还给动态组的同志，就此结束了近五个多月的简报工作。

### 3. 破译密电码

此外，在简报组工作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想提一下。因简报组的办公室是原动态组用的房间，而且就在动态组旁边（学九楼东侧朝南），加之简报所需的素材多数均来自动态组收集到的资料，因此，动态组的头头和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学生）经常到简报组来聊天和交流。大约在八月下旬的某一天，动态组头头（是郑文卿还是吕××记不清了）到我办公室来，交给我一份电报，并说：宋老师你看看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帮个忙？我打开一看，是一封没有译出的电报，整张纸都是打印的四组一节的标准电码。看毕我说：你可以到院办或收发室借一本标准电码本查对一下嘛。接着他说道：我们已经查对过了，译文很乱，完全看不懂说的是是什么。所以想请你帮个忙看看能否译出，以便得知其真实意思。因当时简报组的工作已近尾声即将结束，我也没什么事，就答应他试试看吧。说实话，破译密码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我并未接受过这方面的点滴训练，是否能解开电报的密码完成此任务，当时我也毫无把握。

他走后，我借了一本标准电码本，对照电文认真进行了译电工作，所得结果确实如同天书，完全搞不懂电文的意思。但我知道，此时若想直接找出密码的规律显然是有难度的，因为，在完全不知道收发双方的背景情况下，很难找出破译规律的切入点，也会大大增加破译的难度。所以，我改变了想直接破译的简单想法，希望能从收发双方的背景着手，看看能否找到破译规律的切入点。

因此，我仔细研究了收发电双方的地区和邮电局，发电方是四川成都或重庆（记不准了），收电方是北京学院路邮电局。因此判定发电方肯定与四川的两派人员有关，而收电方则是同方派到北京来的人员（因当时全国各地矛盾双方均有大量人员到北京告状或打听

消息，用现代语言就是上访人员），从而大大缩小了人员的背景范围。通过进一步研究电文，我发现，在成组都是四位数字组成的标准电码中，不时会出现三位数字的电码，而且该电码都是：826。据此，我联想到在四川有个“川大八二六”的造反组织。我觉得这一线索极其重要，说不定就是打开密码规律的切入点呢！因此，我立即查看电文原文中“826”前边的两个电码，并记录下来仔细分析。一经分析就发现了规律：即在这两个电码组合中加一或减一（记不准了），就变成了“川大”两字的标准电码。这下，我兴奋极了，立即将电文中所有的电码均加一或减一，然后再译该电文，结果就得到了完全通顺的电报译文。我将电文译出并誉清后，立即去动态组交付，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该电文现在我大致记得的，是说“川大八二六的头头×××，即将赴京，并于×月×日×时在北京医学院×楼×室开会，介绍当地情况并商量对策，请准时参加”。我的印象该电报是发给我院二团的，但具体请谁去参加会议已经记不清了。

#### 4. 父执的忠告

能比较顺利地从未接触过的译电工作，当时我内心还是挺得意的。所以回家后，我就将此事如实地告诉了我的父执——我父母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好友，待我和我姐姐们都非常好。解放后我几乎就把他那里当作自己的家，而且我上学期间所需的生活费用几乎也是由他提供的。他是1923年的老党员，在总理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副部长，于1976年6月谢世。因工作性质关系，文革期间他未直接受到冲击，但林彪一号命令后，也被疏散到江西抚州，后于1972年回到北京。在我个人档案里，我曾作为社会关系填写在案，但按我姐姐的嘱咐，我从未与同事、朋友们谈过我与他关系。但文革反干扰期间，在揭批我的大字报中，却有一张掘进教研室程锡宁老师署名的的大字报，揭发我有高干后台，并点出该老同志的名字。程是如何知晓这一关系的，确实令我费解。但幸好在我被整、被批斗、被隔离关押期间，无人再次提到这层关系，因我确实担心由于

我的出身和被整肃的现况会给老人带来不好的影响——没想到他老人家非但没有给我任何肯定，反而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等于是在搞特务活动，这样做很不好！老人的这一批评，确实出乎我的预料，但也让我开始有所清醒，迫使我开始进一步地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

周末回校后，出乎我意料的是，译电的事并未因电报译出而结束。相反革委会通知我，届时由我冒充收电方去北医参加会议。同时嘱咐我注意两点：只听对方介绍，不具体表态承诺，推诿回校汇报以后再作答复；若对方产生怀疑，尽量辩解。万一无果甚至被识破后，就坦率承认冒充，避免发生冲突和遭到殴打。有我们安排的人会回校报信，届时再派人前往谈判、营救。面对领导的这一安排，尽管有老人的告诫在我耳边回响，但我确实难以拒绝。因为，一方面这是组织上安排的任务，也是组织的信任；另一方面，组织上已经考虑得很细致了，连万一需要“营救”都考虑到了，根本没有商量的口气，不容我再有任何异议。因此，我也未再多想为何我们要这样做，也未想这样是否合适，相反只能坦然地接受并认真去执行了。所幸一切顺利，在我一人冒充前往参加会议时，我首先以真实姓名做了自我介绍（但冒充是蔡派派来的），对方对我无任何怀疑。至会议即将结束时，我才表态说：回去后我会将情况马上汇报，待研究后再将情况转告你们（但究竟对方讲了哪些问题，需要我院蔡派哪些协助，为何要搞得如此神秘等问题，如今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回校后，我立即将会议情况作了汇报，至于革委会为何需要这种情报我当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但却觉得老人对我的告诫是对的。这种事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极不光彩，所以再也没有电文译出时的那种得意了。从这一小插曲中可以看到，当时自己已经陷入到派性斗争的盲目性泥潭，丢弃了对大方向和大原则的思考和辨析，思想的惰性增加了，服从、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等驯服工具教诲中提倡的意识品德，又重新以完全正面的美德和高深修养的面貌，再次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站了上风。也就是说，从对过去领导的盲目服从，重新回到对现今领导的盲目服从，其劣根性的本质——盲目、盲从性却丝毫没有改变。■



【访谈】

## 谭保华谈 1966 年 12 月受命抓彭德怀

杨东晓主持 戴为伟整理

受访人：谭保华

主访人：杨东晓

采访方式：录音

时间：2010 年 5、6 月间

地点：中国地质大学附近茶社

杨东晓：请您讲一讲当年抓彭德怀到北京的事。

谭保华：关于抓彭德怀去北京的事，发生在 1966 年的 12 月中旬以后。我是 10 月底左右大串联的时候去的四川。我们 10 月份到成都串联的同学成立了一个驻蓉联络站，我那会还不是负责人。在四川参加一个重要的辩论会，就是 11 月 13 日大会。那时四川才开始分派，这个辩论会在四川文革初期的影响非常大，就不细说它了。

到了 12 月 15 日，我们驻蓉联络站的王大来，接到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公社总部的负责人朱成昭的电话，说中央文革戚本禹通知他，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去，交代问题，交给群众批斗。朱成昭说这个任务就由你们驻蓉联络站负责，王大来就安排张华清和郑文卿两个同学，拿着彭德怀的照片，到西南局去堵彭德怀，看他住在哪儿。他们不知道彭的住处，只知道他是大三线建委的副主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所以在西南局门口的广场上堵。结果第二天就看见彭德怀跟一个警卫从大院里出来。看着像彭德怀，郑文清就上去问，是彭总吗？彭德怀很直率说：是，我是彭德怀，要到外面药店去逛一逛、买药什么的，你们有什

么事吗？张文清他们说，我们也到附近看大字报、买药，就一路跟着他到了一个药店，假装买了点药，后来就尾随着彭德怀，又回西南局。

在西南局建委有两座小楼，彭总住在一个楼的一层。知道了彭德怀的住处后，他们就回来汇报，联络站开会，派王大来、钱新、陈宝堂、杨文远，当时几个负责人，找彭德怀去。在两天左右时间里，他们跟彭德怀谈了三次话，都有记录。彭德怀在谈话中表白自己不反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至少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正确的。这些同学在联络站商议，说彭德怀不反毛主席，要不要抓他？因为当时彭德怀是解放军的副总指挥，又是当时毛主席赞扬过的彭大将军，朝鲜战场威风凛凛，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所以我们对彭德怀是很崇敬的。当时不认为他是老三反分子。说要揪斗他，大家很犹豫。

王大来给北京总部的朱成昭打电话，说彭有进步，是不是不急于抓他。朱成昭说，这是中央文革戚本禹的命令，你右倾，你不抓他，你右倾。朱成昭下令不让他管，给武汉王大宾打电话。王大宾是地院东方红的另一个负责人，当时大概排行第四、五，但是他在武汉串联，朱成昭让王大宾赶紧赶到成都去抓彭德怀。

那会王大宾已经到了重庆，朱成昭又给驻重庆的联络站打电话，要他们转告王大宾。王大宾到了重庆，就接到了朱成昭的指令，说你赶紧到成都去组织红卫兵，执行中央文革抓彭德怀回北京的任务，你赶紧去。王大宾就带了一些学生，赶到成都。那是12月18号。当时我们都在成都串联。

王大宾听了王大来的介绍，也不赞成抓。为了跟总部说清楚，干脆派王大来和郑文清坐飞机回北京，向朱成昭汇报。朱成昭心想，这是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下的命令，就派北地东方红公社的另一负责人杨雨中到中央文革去汇报请示。戚本禹对杨雨中说：彭德怀说毛主席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那就是说，毛主席的话还有百分之一是错误的。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你们都上了彭德怀的当了，毛主席跟他斗了四十多年，深知他是个老三反分子，你们要抓他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要不然你们就别管了。

戚这一发火，大家都慌了，心想不抓不行啊，这是中央文革的命令啊。这样，朱成昭就下令，让东方红的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赶紧坐飞机上成都，由他传达中央文革戚本禹的命令，同时也代表总部去下令抓彭德怀。

胡乐成是12月22号到成都，就和大宾、张华清，还有我一块在联络站商议这事，传达朱成昭的命令，也传达戚本禹的指示。还说周恩来总理也给成都军区打电话，说了三项要求：第一，彭德怀只能坐火车回北京，不准坐飞机，这是为了人身安全；第二，由成都军区和我们红卫兵共同押彭德怀一块回北京；第三，在路途上，不准出现任何差错，要仔细。有了周恩来的三条指示，我们就不能再犹豫了。于是决定，第二天中午去抓彭德怀。

12月23日上午准备了宣传车，中午带四川地质局的小卧车，还有好多人，好多相同观点的群众上了宣传车，一块赶到了西南局建委小楼。到了以后，他的秘书綦魁英说，凌晨三点，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五个人和成都地质学院的红成部队（他们的红卫兵组织叫红成部队，简称红成——口述者），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去了。

这还了得，我们商量之后，就派宣传车，带大量人员，足有七八十号人，坐着大卡车、小汽车，还有我们串联在成都高教局的一帮人，赶到成都地质学院去找彭德怀。

到了成都地质学院一打听，当时成都地质学院“红成”，有个解放大西南的总部，占领了一个教学楼，可能安排在那里面，我们就到了那个楼上。一看楼门口都用砖砌起来了，我们心想肯定在这里头，我们就冲进去了。他们守门的拦不住。我们冲进去，在二层的大教室里发现了彭德怀。

那是中午12点多，正吃饭呢，所以看守的人很少。彭德怀一个人呆在大教室里。那屋里有几个长条形的实验桌子。他有一个50多公分长的手提包，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人造革的双耳手提包。里面可能装了一些随身的东西。他带了一个呢子质料的帽子。我见了彭德怀以后，就给他鞠一躬，说，彭总，我们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我们受中央文革的指令，请您到北京去。彭德怀很沉着、很冷静，说，上哪都可以。但是看得出，

他明白，这是中央要把他抓回北京了，所以这会他眼睛看着窗外，很沉静的看着窗外也不多说话。

这时候，我们还有一同学在楼下跟北航的人交涉。他们说已经联络飞机了，要把彭总接北京去。我们说坐飞机不成，那不安全，只能坐火车去。双方争执不下。我们人多，就干脆就从楼上请彭大帅，说你跟我们走吧。彭德怀说，你们也是北京的，可以。这样就把彭德怀接到楼下，坐着成都地质局的华沙小卧车，接到成都地质局去了。

我们宣传车就堵在他们学校的马路上，他们后面追的人也赶不上来。我们冲出成都地质学院的大门，在成都绕了好几圈，怕他们追上我们，我们绕来绕去，绕回四川地质局了。到地质局之后，赶紧就把楼门封了，把各个楼层的拐角，楼梯口都给把住，把彭德怀安排在三层的一个套间里面。他住在套间的里侧，套间外面是一个大屋子，我们红卫兵住在外屋。那里屋其实很简陋，下面铺的是草帘子，上面铺上褥子，被子。当时是12月23号，天已经有点凉了，我们派地质局的人端来炭火盆，给彭总烤火。又安排食堂给他专门做饭。过了一阵子之后，彭德怀的驻地有一个班，负责他的保卫，他的两个保卫参谋知道彭被抓到地质局了，也都赶过来了。

这些解放军战士就在楼梯口和外屋呆着，我们的人也在外屋，彭总住在套间里屋。在地质局住了两天，我们联络站开会，已经抓到彭德怀了，怎么回北京？周恩来总理有指示，要由成都军区和我们共同负责把他押到北京。所以会上王大宾决定，由我找成都军区联络回北京的火车和安保事宜。我找到成都军区作战部部长汤野，汤野说，我们成都军区负责和火车站联络，安排软卧。彭德怀上火车，由我们安排，保卫的人员，也由我们负责。我们副参谋长谷万才亲自跟着押运火车。这都安排好了，就等他电话。

军区第二天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安排在12月25号下午34次到北京的直快。说在直快后面单加了一节软卧，专门让彭德怀坐。警卫跟着车，我们红卫兵跟车，当然他的副参谋长谷万才亲自坐车押车，我们东方红负责人王大宾、钱新等人，带着七八十个红卫兵也都上了车。军区还通知说，你们送彭德怀上火车站，就走火车站旁边派出所的大门。说我们

负责跟派出所长说好了，你们的汽车到大门口按三声喇叭，大门就开了，派出所长亲自把你们放进火车站，你的汽车、小卧车，直接能开到站台上。

到了12月25号的下午，大家很重视这个事，沉不住气，派几个同学到火车站去看软卧车。他们上了软卧，检查了一遍，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成都军区还派警卫战士，也上车检查了一遍。我是三四点钟到的火车站。我着急慌忙，快四五点了。12月份，天黑的早，已经有点擦黑了。我着急在便道上跑，撞到一个人，结果一看是汤部长。汤部长也不放心，他很负责任，在火车站现场安排。这一来，我放心了。

当时汤部长说，小谭，可以接彭总来了。我赶紧回地质局，由地质局的两辆车，一辆奔驰在前面打前站，怕人破坏，就没敢让彭总坐奔驰车里头，我坐奔驰车里给前面开道，他坐华沙，跟着我的车后面，一直开到火车北站。到了派出所大铁门前，按三声喇叭，那门就开了。派出所长冲我们的车站直了敬礼。他一挥手，我们开着车就直接上了站台。王大宾、钱新一帮负责人都已经在那儿了。我们有上百名左右的红卫兵同学，都集中在火车站，一大帮围成人墙，请彭总下车，我们搀着他。彭总个儿不高，1米7左右吧。我们等于把他给架起来了，他脚都不沾地，在同学的簇拥下，抬到软卧里去了。上了软卧以后，火车站问什么时候发车？我们问有没有暖气？

说列车有暖气，但是新挂的软卧暖气管没接上。我们想这不成，彭总岁数大了，天这么冷，没暖气不能发车，要求车站赶紧找水暖工把暖气管接上。火车站说不好办，嫌我们罗嗦。我们说嫌罗嗦也得赶紧派人弄。他们不知道是彭总，那会还对外保密呢，只说是个首长，他们以为是军队一个首长，只好派水暖工来，把暖气管接好了。火车一启动，暖气输送过来了，摸着管热了，才算踏实。我们对彭总一直是很恭敬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动他一手指头，骂他、训他，朝他嚷嚷，没有。我们跟他聊天，也是把彭总当成长辈、首长来对待。

彭总跟我们聊什么百团大战，什么庐山会议，大跃进什么的。他只是说，大跃进不要那么大张旗鼓的，都不生产了，全都砸锅卖铁，这个方法我不赞成；我赞成稳步的做。我不反毛主席。他说了好多，大家也都是很相信彭德怀的。

车要开了，张鸿彬要跟王大宾说什么事，本来是准备留下来的，因为他是联络站负责人。可是火车一启动，他也不敢跳下来了。他就在火车上跟我们说，老谭你就在这儿吧，成都这块你来收拾残局吧。

彭总是12月25号下午5点多钟，将近6点钟开的车，到北京得花20、30个钟头，到了27号才到北京。

当时串联的人特别多，车走得比较慢，12月27号到北京站。卫戍区的一连战士，在李钟奇带领下要把彭德怀接走。王大宾也赶到了，说不能交给卫戍区，得问问中央文革。正在扯皮呢，车站调度车皮，因为这一节软卧是单加上的，北京不知道里头坐着彭德怀。把车皮甩出去。这一甩，就退到了永定门车站。北京站的卫戍区战士看着火车退走了，他们也挡不住，就打电话给地质学院，派学校的校车，赶快到永定门，把彭德怀接到学校。

27号晚上，我们给总部打电话，说聂克到北京了。这是我们为了安全定下的暗号——地质学院有一个副书记叫聂克，我们就把彭德怀叫聂克，说聂克到京了，总部就知道是彭德怀到北京了。可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到了地质学院找王大宾，说中央和周总理要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卫戍区派了军车，坐了满满一车战士，就把彭德怀接走了。从那以后，地质学院就再没有能够单独接触彭德怀，后来他频繁的挨斗，直到去世，都没有接触。

我们抓彭的这一段，是我的亲历，这都是事实。到后来的报纸有一些文章，还说过一些，说红卫兵怎么虐待彭德怀，什么打他，这都是杜撰的事了，根本都没有。

还有一个事就是彭德怀的枪。因为23号抓的彭德怀，到了四川地质局以后，我第二天跟成都军区商量好了，说25号要走，他的两个保卫参谋也是要跟着走，带着保卫战士跟着走。但是火车不让带枪，那会儿社会上乱，大串联，爬火车、挤车的人特别多，就怕路途上把枪丢了不太好。不知什么细节，反正他的这个警卫秘书，就到四川地质局找了我，和

我的同学蒋光宇。彭总有两把手枪，一个黑的长一点的，可能是勃朗宁手枪。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银制的手枪，据他们介绍说，是捷克送给彭德怀的礼品枪。这个枪很短，口是方形的，膛是圆的，这么一点，手大的话，搁到手里就看不见。他说：这两把枪，你们是不是替我们保存，以后我们再来取。我们说好吧，当时就拿纸写了枪号，给了他，然后把这两把枪给我们了。这样，他们就跟着火车上北京了。我们到处藏，本来想藏在电扇坨里头，可是又搁不下；藏在消火栓里头，又怕万一谁动消火栓。想来想去没办法，就找沙发的缝里面，搁在垫子里面。那会我们联络站在四川地质局，也有我们站几个办公室，里面有沙发。

只有我跟蒋光宇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这是12月份的事。可是1月份，四川的运动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复杂了，到了67年2月18号，直升飞机到成都上空撒传单，捡来一看，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把86派和成都工人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全城戒严抓人，抓了十万人。全城到处是大卡车，捆了人一串一串，五花大绑，我们也被抓走了，四川地质局也被抄了。等我们被抓走了以后，当然对立派就把我们办公室都给占了。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沙发就找不着了，都给运走了，说搁仓库里去了，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有枪。等我们找了成都的运输车队，跟我们这一派的车队，想逃回北京，结果在半路上，就被成都的野战部队的独立团给逮了。逮了之后，独立团的团长审问我们。等审到我，我说我叫谭保华，是北京红代会红三司的。我说你不信，就问成都军区的作战部长汤野。他的独立团受成都军区领导指挥，都认得汤野，作战部长他能不知道？他们还真打电话问了。

军队的电话很快就通了，一问谭保华，因为跟我都商量好，几天前见的面，汤部长说你抓他干嘛，他就是首都地质学院红代会的，不能抓他，赶紧把他们放了。独立团赶紧把我们一二十人给放了。放了之后，就把我们扔在东城检察院了。成都东城检察院人山人海，抓人的时候，那个架势，太可怕了，成街的车，车上一派是押人的，一派是挨捆的，每辆车上都押着十几个。押我们的车，给我们五花大绑捆着，连嘴都勒着，腮帮子都给勒坏了。结果送到检察院了，我们就唱歌，带背毛主席语录，带嚷嚷，只有我们学生不怕死，也不

知天高地厚。他们也没辙，因为军队把我们放出来，也知道是红代会的，北京的，他们不敢押了，给检察院了。检察院也听说一点，所以对我们也客气点。我们一嚷嚷，原来关在检察院院子里，蹲着的，全站起来了，全跟着我们背语录，唱语录歌。

后来就跟四川地质局联络，也是我们这一派的代表都来了，带着胸章，是我们这一派的来接我们，但是也没敢露出来。我们在屋里呆着，他们把棉袄翻起来，一看里面有胸章，我就知道是我们的人，他们把我们接回地质局。到地质局，找我们的办公室，把沙发从仓库又找回来。我们一摸手枪还在里面。到了2月下旬，给我们枪的秘书，专门坐飞机从北京到成都来，就为了取枪，拿了那个写枪号的条跟我们一对，就把枪拿走了。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挨整的时候，也都是大问题。但幸亏都是落实了的，有枪号、有人名、有时间、有地点，他们外调也调查清楚了。后来这两个秘书，还写过回忆录什么的。然他们的回忆录，是他们经历的一段，有真实的，也有出入的地方，就不细说了。

反正彭总在我们接触的这段时间里头，从我们东方红的头头到联络站的同学，都是非常恭敬彭总的。我们很热爱他、尊敬他，很崇拜他，对他绝对是恭恭敬敬，照顾他很周到安全的。结果到了北京，卫戍区把彭德怀，28号给接走的时候，也有一个负责的人。当时彭总的警卫还想上车跟彭总告别，都不让他们上大轿车。最后他俩说，我们跟了彭总十七年了，让我们跟彭总道个别吧，这才上车，跟彭总打个招呼。彭总站起来给这俩警卫鞠了个躬，说谢谢你们俩。反正从那以后他们很伤心，从此再没见过彭总。所以，我们从心里想，彭总真是受委屈了。他去世的时候才76岁。这么一代英雄，开国元勋，就这么受冤屈死了。直到后来十二届六中全会，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才给彭总平了反。

杨东晓：您包括您的同学都对彭总非常恭敬，但是您最早讲的时候，当时从中央文革来的指令很严厉的。

谭保华：对。

杨东晓：江青那段话很严厉的，你们其实也知道，彭德怀是被中央文革盯住了，到北京去交代罪行的。



谭保华：对。

杨东晓：其实你们对彭德怀的恭敬，照顾，是和当时的背景——

谭保华：是冲突的。

杨东晓：这个怎么解释？

谭保华：所以当时在成都开会的时候，就因为和彭总谈过那么几次话，也有记录嘛，驻蓉联络站的同学商量的时候也是说，根据彭总那些话，认为他态度有转变，好像不像原来说的，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怎么反党、反革命集团，很嚣张什么的，还是觉得他有进步，对毛泽东思想也有新的评价，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对的。所以那会就犹豫，就不想抓他。王大来也不想抓，后来汇报挨了批，不让他管了，让王大宾来管。王大宾来了也不赞成抓，最后派胡乐成，胡跟王大宾吵得挺凶。最后觉得是中央文革戚本禹当面交代给朱成昭的，这你不能不管了，周总理又打电话交代了三个要求。我们心想，这绝对是中央的意思了。那会儿是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啊！那会儿的口号就这样说的，报纸上都是这口号。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再不抓的话，就等于和总部决裂了，等于和中央文革对立了，这个责任就太大了。所以不敢不抓。最后决定第二天就去抓，当然这里面出了一个岔，和北航有这么一个岔。

杨东晓：其实当时对红卫兵来说，首先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因为文革已经定了这个调子了。另一方面，你们根据以前对彭总的了解，和彭总的交往，对他有一些尊重和同情，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太符合要求的。因为当时肯定红卫兵是立场第一，而且刚刚你说，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指示，要求要抓彭德怀。当时那个情况下，抓到北京的后果，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你们也了解。

谭保华：当时抓彭，心里觉得还是执行中央文革的指令，认为这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行为，所以不抓是不成的。但从心理上是同情和崇敬彭德怀的。从命令来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因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她说的话，难道是错的吗？那会还有一个口号，周恩来都带头喊过，谁反对江青谁就是反革命。所以在12月中旬，这些首长接

见高校几大造反领袖的接见会上，江青亲自喊出来的，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你们怎么不去四川把海瑞抓回来？他在那儿看大字报逍遥自在，等他养神十几年以后，把我们又打到十八层地狱里去？！这些话都是同学们亲耳听到的。当时连周总理，（中央）文革的人，都没置可否啊！没有说挡着不让说，也没表示赞同，都不置可否。那当然作为年轻学生来说，亲耳听到首长这个话，加上毛主席夫人说这话，就认为这是来自最高指示，就是这种理解了。当然那时候亲自参加这些会，我们都很熟的同学，打电话都告诉过我们。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加上总理又有三条指示，又让找成都军区协助，就认为这个事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了，所以才下决心抓了的。

杨东晓：您刚刚第一遍讲述的有一句话，我想能不能准确表达一下？因为您说过一句话是，您对彭总是非常尊敬的，可外面有传说，说是红卫兵怎么迫害彭总，那都是杜撰的。我想请您把这句话，严格的框在仅仅是你们这一批红卫兵里头。因为你们把他交出去以后，社会上其他红卫兵对他的批斗，这个是存在的，对他迫害是存在的。

谭保华：对。

杨东晓：以免人们对这个有误解。

谭保华：在我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抓彭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严格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彭德怀的人身安全。

在抓彭德怀的过程中，我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对于彭总都是恭敬和保护。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绝对保护彭总的人身安全。所以到了四川地质局，天冷了还给赶紧弄火盆，炭盆，让他取暖，专门安排人负责他的食宿，给他做饭吃，而且在楼道里安排保护，不准闲杂人等上楼，不准外人接触他，对外也保密的。我们也没有任何人举行过什么批斗，让他交代材料，都没有。就是传奇人物跟我们讲故事，听彭总跟我们讲了一些历史。当然他自己也谈到了，承认自己也有一些错误，譬如百团大战，提前暴露了解放军的一些力量，招致日寇的围剿，受到一些损失。还有朝鲜第五次战役，当时被美军给截断了以后，是有一点损失，所以他承认，也是有过一些错误。但是对于反毛主席和里通外

国，他是坚决否认的。他说我一句外语都不懂，我到苏联不通过翻译我能说话吗？说翻译关都过不了，我怎么里通外国！所以彭德怀是很气愤的。

后来彭德怀专案组给他定案的时候，说他里通外国，那是非常诬蔑他了。我们与他接触的时候，他是坚决否认这些事的。我们也完全相信彭德怀的话。因为他跟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无怨无仇，他跟我们说瞎话干嘛使啊！他那会已经快70岁的人了，我们从心里相信他。因为毕竟他是副总司令，是个元帅，又那么大岁数。我们那会才23、24岁，应该说是爷爷辈了。说实在的，我们是很相信他，很尊重他的。

那时候红卫兵大多数都是非常真诚的参加文化革命，没想升官发财。至于上面有什么想法，作为年轻学生，我们根本闹不清。我们抱着真诚愿望，紧跟中央干革命的，打倒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至于谁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谁知道？可是事态发展到最后，我们也都挨了整。大家也都明白，我们是被人当枪使了，做了助纣为虐的事。所以说，彭总的死，我们心里是很不安的，都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扣我们帽子，说我们反彭德怀，抓彭德怀是阴谋诡计，我们是坚决不接受的。这件事是中央文革下令，红卫兵执行，而且我们是遵照总理的指示认真执行的，根本不是阴谋诡计。所以我们挨斗，是替他们阴谋家挨斗。

我希望彭总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慰，也希望红卫兵的名声不要受到这种诬蔑和玷污。后来有的红卫兵组织批斗过彭德怀，尤其是北航红旗，包括它的负责人韩爱晶都打过彭德怀，他自己也承认。应该说红卫兵那会都是20、30岁的学生，我相信都是真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没有搞什么阴谋诡计。

66年12月27、28号，卫戍区把彭德怀从我们学校弄走以后，我们再没有单独见过彭德怀，也没有单独批斗过彭德怀。他在各单位批斗，据说得有上千次，坐飞机、挂黑牌、扭胳膊、罚站，反正是很残酷。最后彭德怀真是心力憔悴啊！唉，不说了，一晃47、48年过去了。这么一代元勋，开国元勋就这么驾鹤西去了。幸亏邓小平、胡耀邦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做了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彭德怀平了反，还有所安慰。■

【述 往】

## 拾 珠 串 链

### ——我的记忆碎片的整理（之二）

唐振权

#### 老九，都需要上“五七干校”

文化大革命时候，社会上把知识分子贬称做“老九”，起因于对原来打倒和批判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之后，文化大革命中又增加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共八种人。人们于是又把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为第九，这就是“老九”的来历。这是文革中民间的流传，官方正式书面的文字里没有这样的称呼，而社会上谁都知道“老九”的涵义。因为极“左”思潮对知识的轻视，对人才的不尊重，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靠边站。因此也就不分什么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统称“老九”。其实，这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调侃和自嘲。

1969年秋，学校里已经没有了学生，教师、干部、职员们都无事可干了，不能总是学习批判，闲呆着。这时候中央和地方机关单位也是精简机构，编余了大批的干部，还挂起来不少的领导干部，为安置这些人，各单位都办起了“五七干校”。高等学校和各事业单位也立即效法，办起干校。

“五七干校”是遵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起名办起的。1966年5月7日的，毛泽东批转林彪关于军队办农场的报告，做出一个指示。毛批示说，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他还说，学生要学军、学工、学农。……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毛总在琢磨怎样一个办法，让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参加体力劳动，否则“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毛认为当官的应该轮流的到农村去，不能总高高在上，脱离

群众，脱离工农，这样势必产生特权地位，走向腐化堕落。毛泽东警告，要防止苏联修正主义的重演。

1968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发表整改经验，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办了一个农场，定名叫“五七干校”，既教育了干部，让干部劳动锻炼，又安置了精简下来的闲置人员。这个经验让毛泽东如获至宝，毛正愁如何实现他的“反修防修”的设想，让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都能到农村去接受教育。黑龙江这个办法真是两全其美，既能够让干部下放去学农，接受教育，又能够大批集中实行军事化管理。于是让报纸、广播宣传、推荐，又发表评论，责令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都要办“五七干校”。知识分子和干部们要轮流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1968年初至1969年末，北京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都办起了“五七干校”，开始时只是要受教育的本人去干校，目的只是单纯地进干校去学习锻炼。到后来中苏之间形势发生骤变，因为战备的要求，去干校凡是能举家全去的，不管夫妻双方是否是同一个单位，家属是否是在职职工，都一律同去。这时候正好中苏边境发生了两次战斗，据传林彪下达了一个一号命令：准备打仗，疏散人口。所有的干校都选在南方远离北京的地方，也正是表现了这个意图。人们忧心忡忡，害怕真的打起仗来，不愿全家分开。都很自愿自觉地拖家带口到干校去。一切能带的东西都带上了，一些家连蜂窝煤都舍不得扔掉带上了。这哪里是去干校学习，简直就是举家逃难。

我们的干校选在江西峡江县，赣江之畔，倒是一个环境很不错的山青水秀的丘陵山区。原是当地的一个农业学校，有不少的校舍，但绝容不下几百个家庭的安置。凡是有老有小的家庭，都安排住在附近村子里农户的家里。干校里的组织按连队编制，我们探工系和机关党政干部，加上数学教研室编成了一个连。一到干校的首要任务就是盖房子，解决房子不够住的问题。来到干校时正是十二月份，江西还不算很冷，大家一起凑合着挤着。有几个连队的家属住在了离干校很远的农村里，不必来干校参加劳动，但是要二丁抽一，一人须住在上面参加劳动。住在上面校部的，夫妻或孩子大的，分别集体住在男女大宿舍里。

我的家和戴学恕的家就在离校部不远的村子里，我和爱人徐宏勤轮流到校部，我是参加劳动，徐宏勤在自办的小学里教孩子。

我们连因为主要是探工系的，以从工为主，为盖房和修路凿岩放炮，开山炸石、打铁、电焊、车床、刨床加工、抽水发电。还有人破竹修篾，带领体弱女同志编筐编箩，为装石、装土、装粮作工具。传说某处有煤，还被派去开凿竖井，挖矿采煤。自造的轱辘提升渣石，当然也就挖了二十米不到，也花不起支护费用，只能作罢。这也是带队的军宣队的主意，但是再蛮干下去，他也怕出危险担当不起责任，停止了异想天开。还有一件更是天方夜谭的事：干校就一台破车床、小刨床和台钻，军宣队要我们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自己造拖拉机。干机工的几个老师不得已，提出了增添设备的要求，当然无法做到，也就不了了之。

过了冬，春耕开始了，比较年轻的教师干部抽调出来学习开拖拉机，一部分人跟着农民，学习催芽育秧，在小块田上用牛犁田、耙田。较大的田块用拖拉机犁田、耙田。要插秧的田地放进水，平整田地，准备插秧。插秧时能劳动的人都一齐上阵，起秧，运秧、插秧。我们倒是不用起早贪黑，人多力量大，很快就完成了插秧任务。尽管大多数人都没有干过多少农活，尤其是水田种稻的活，但毕竟是简单劳动，知识分子们一看也就能跟着会干了。毛泽东非要知识分子和干部下到农村劳动，是否就是要这些人经历吃苦受累，劳其筋骨，达到锻炼改造的目的，这样就能防修正主义，防资本主义复辟，防止腐化堕落？但是，这样的多的人集体劳动干上那么一点点，谈不上什么吃苦，比起教学科研的脑力劳动，倒是轻松愉快的多。尤其是对这些学地质搞地质的人，这点苦简直算不得什么。而我们心里真苦，苦的是我们学不能所用，在这里荒废时光，浪费人力。

当时所谓的政治学习，也就是开开会老一套的学“老三篇”，读《语录》，隔三差五地把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和戴着各种帽子的“牛鬼蛇神”批斗一下。这里名为学校，实质上是劳动改造场所。我们同一个连的党政机关和政治教研室的人，他们倒满不在乎，对这些都无所谓，没管它是什么劳动还是学习。在小组会上他们也不过多的官话套话，会下平常更是调侃穷逗，毫无正经，和那些刚在会上遭批判的人，也谈笑风生，若

无其事。过去我和他们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对政工干部多是敬而远之。现在较多的接触，发觉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确实比我们强。他们对当时对政治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表露出来，比我们更有心机。我们探工系的人学工的头脑还稍活泛一点，数学教研室的人却是死轴，批判起来真是认真，平时会下对那些所谓有问题的人，也绝对不苟言笑。有一个女老师，后来还是知名教授，并且做了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就因为说话耿直，家庭出身是旧政府高官，文革中自然会受到冲击。可是我们那些并不极“左”的政工干部（极“左”的不会被发到干校），对她从不另眼看待，还常常直呼其名。我以前认为搞政工的都左，这是很片面的。只是那些爱整人的，他们惯于跟风。现在才感到真正的政治工作者，确是有政治头脑的，特别那些教政治理论课的更是这样。

我们在干校还有一个重大的劳动任务就是砍柴，食堂每天供应一千多口人的三顿饭，用大灶烧掉的就是几千斤的柴火。一个星期有一天是砍柴日，各连队全体动员上山砍柴，每个人的砍刀都是自备的。砍柴头天都磨好柴刀，第二天吃完早饭，就拉上板车集体出发上山砍柴。最初砍柴还在干校附近的山上，后来越砍越远，不到一年，就深入到十几里远的深山里。我们砍的柴不是小灌木的毛柴，因为要塞入到大灶膛里，细柴草轰燃一下就没有了。柴火都是杯口粗细的小树，砍过以后向前推移，砍过之处就像剃头一样光秃一片。老俵烧柴都是细小灌木或修枝砍下的树枝。而我们砍柴对野生林木除大树外一律砍尽，现在看绝对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个时候为了政治需要，即使是造成荒山秃岭，给农民的家园造成破坏，也是在所不惜。1964年我去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大山里的一个地质队，看到山上满是粗大树木的树桩。那是为了大炼钢铁土法炼钢，把上百年的林木砍倒烧炭。这样的破坏有谁来管呢？为防修改造干部知识分子，烧一些次生山林又有什么大了不起的。

我们种两季稻。早稻插下以后，田间管理用不了多少人，大部分人还是忙于盖房和修路。盖房用的木料运到了江边码头，我们百多名体力较强的男性学员两人一组，把松树原木接力扛运到干校。大约十公里路程，上百根的木料完全是人力搬运了回来。很快原木打柁上梁，钉板挂瓦，房子抢在了雨季前封顶。一条大约三四公里的连接干校另一个聚集点

的石基路，也在雨季前基本上铺好，可以通行汽车了。我们还进行了一项大的基本建设，就是通电工程。我们从十几公里外的高压电网上，引入高压电。原来靠自行发电，电力就不足，又盖起了很多宿舍，根本解决不了照明问题。没有电力线路，必须我们自己栽杆架线。在县电业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翻山越岭抬着几百斤的水泥电杆，分别埋设在线路上，固定好担铁瓷珠以后，再大家通力合作，把电线拉架到电杆上。十公里不到的直线距离，二十几根杆子，折腾了我们一个星期，真是把我们累坏了。这还是 660 伏最低的三相高压线（也就是最细的线），可见在崇山峻岭架设几万伏到几十万伏的，上千公里的超高压线，该是多么困难。电力建设的工人们和工程技术人员，艰苦的风餐露宿的野外工作条件，逢山攀登逢水跨越，不断延伸的幸劳作业，一点也不比地质勘探工作者差。为什么小农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只认为农民辛苦？各行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其实农民辛苦的不是劳动，而是农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养活不了自己。中国农民可怜的一点耕地，还要接纳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还要安置城市里的知识青年，甚至城市里的无业人员。大锅饭的集体劳动，挣下的一点工分，连买口粮钱都支付不了。下放到农村的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是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看到的是农民的苦难，农民生活的艰辛。

春天三四月的时候，干校所在的那个小山坳里，简直是美极了。山丘是郁郁葱葱的松树和灌木丛，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把一片一片的山坡映红，称谓映山红，夹杂着白色的栀子花。走进了山林，香气袭人，沁人肺腑。我们干校的前面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春天的雨量充沛，跌宕处哗哗地流水声，发出悦耳的歌唱。小河蜿蜒曲折，转折处形成一个小水潭，小河两岸和水潭周围是青翠的水竹，和荆棘丛生的灌木，组成了屏障，这成了我们天然的浴场。这里有好几个小潭，最前面是一个男浴区，中间一个较大的水潭辟为女浴区，再后又是一个男区，前后保护了女浴区，不使外人进入。每天劳动之后，小河里传出欢声笑语。大人们谈天说唱，孩子们嬉戏欢叫，伴随着牛群归家的哞叫，远处拖拉机的轰鸣，衬着落日的晚霞，寂静的山坳里演奏着美妙和谐的田园交响乐。

凭良心说，这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如果没有烦心的政治斗争，没有假话空话的学习讨



论，这样的生活岂不是神仙般的日子。拿着全额的工资，带着家眷，从城市里躲避到这里休养来了。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也未曾想到的，本来要我们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达到脱胎换骨的锻炼。结果是在这里享了福。什么锻炼改造，是使用国家和人民的钱，浪费折腾，上下一齐糊弄，做一点欺世盗名的花架子。其实我们在这里真没有吃多少苦，倒是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享受大自然之乐。但是我们并没有心旷神怡的心情。没有谁来念这个好，没有人感激这种“幸福”，没有人打心里愿意接受这些。这是在浪费国家的财富，浪费人民的血汗，也是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浪费宝贵的时间。

北大和清华的干校也在江西，在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他们可没有我们幸运，那里没有山清水秀，没有花香松涛。湖泊平原炎热潮湿不说，最糟糕的是水里有血吸虫。两校的教师干部，得上了血吸虫病的人真不少，而且是终身难愈的。这更是对人才的摧残。这样的锻炼和改造，不是把人往死里送？这个账算到谁的头上？

我在种菜班上种了一时期的菜。我们种菜当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也要种一点，大约有二十多畦。种菜作业主要是浇水和施肥。我从来没有挑过担子，种菜每天都需要挑水和挑粪。我一点一点地练习着挑担子，开始肩肿胳膊酸，慢慢地练得适应了，满满的两桶水，也可以挑着走几百米。我们天天都要从厕所大粪坑里舀粪，走在田埂小路上，把粪挑到菜地。然后又从小河里挑水，粪桶里兑上水泼向菜地。泼粪时有时迎着风向，弄得满脸粪水甚至溅到嘴里，粪水不仅臭味难当，还又苦又咸简直不是滋味。开始时恶心的不得了，时间一长，也没觉得脏了，也许这就算是被改造过来了。的确就是为了改造，收获的一点菜送到食堂，也只能是一点搭配，食堂做菜基本还是靠买来的。种菜也倒没有觉得什么苦累，我们地质学院的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娇气，干什么也不怵头，没有干不了的。原本改造就是带有惩罚的含义，偏偏这些人满不在乎，对这些人又能改造些什么呢？

七月份早稻成熟开镰收割，一方面要抢收，抓紧脱粒、晒干、风选，然后装袋过秤入库；另一方面要抢种，赶紧翻土犁田、放水耙平，把晚稻秧苗及时插到田里。这就是最忙的双抢季节。这时候真是不分白天黑夜，在田地上、在打谷场里忙收忙种。连队组织女同

志不时向作业地点送水，送绿豆汤，食堂也加餐做夜宵，供应干活的劳力。南方此时正是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天的紧张战斗，全仗着在小河里洗浴汗水，驱散热气，解除疲劳。这时候劳动之余，在小河清凉的水里一泡，才感到无比地放松和惬意。黑夜还需要打着手电筒，拿着棍子打草惊蛇，到小河里去洗澡。一个月下来，人们一个一个皮肤黝黑发亮，超过当地农民。南方农民干活并不赤背光膀子，这是北方人的习惯，农民们看到也感到新鲜。我们和当地农民鲜明的对比，一眼就区别开来了。

双抢最忙碌的时候，接到北京徐宏勤家里来的电报，说她母亲摔了，腿部骨折住院，她赶紧请假带着两个孩子回京。我也请了一天假，坐船到樟树，把他们送上了火车。我应该跟着送到上海，再转车到北京，但正是大忙时节，没有办法，只好托上海的同学帮忙买票转车。她到了北京照顾，妈妈病情好转。原本说好了再回到干校，这时候她看到北京许多单位，正在大抓“516”。她一想我一定不会脱掉干系，就决定不再回来了。回到他们学校和校长一说，就留下回学校上班了。

幸亏她这样决定了，果真是那样。9月份之后，干校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成了干校的中心工作。我自然是重点被清查的对象，《东方红报》编辑的身份，被当作是“516”，那是绝对没跑的。我也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在清查到我头上之前，我赶紧利用了一个星期天，把徐宏勤和孩子们的东西，托运回到北京。不久以后，我也就失去了自由，被所谓的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被看管了起来，没完没了地责令写材料，交待问题。在我之前，已经拿下了好几个重点的“516”分子了。

1970年前多半年，先是忙于基本建设，又是忙于农业生产。直到秋收大忙之后，干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清查“516”，几乎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到1971年10月，都是搞的这一项政治斗争。那真是战果累累，地质学院的教师干部三分之一的人，被打成“516”。1971年没有了基本建设，农业生产也已是轻车熟路，所以那些执行上级命令者，就全力以赴地抓“516”。越抓越多，抓人的那些人，不少自己最后也成了“516”。我被关了四个多月，从70年10月到71年2月，交待了他们所想要的所谓“516问题”，把我放了出来，恢复

了人身自由，回到了连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那真是没有多少事好干。我们二十多人管理了一片十几亩的麦田，锄锄草、松松土，麦穗长出来之后，人们轮流地到田间轰鸟。那是一长条的山坡地，农村生产队闲弃的土地，无法种稻，我们反正人多就试着播种了小麦，起一点看管的作用。一块孤零零的狭长麦田，左面是河，右面是山林。麦子出穗之后，成了众鸟之的，我们不能不在田边四周设人轰鸟，否则颗粒无收。难怪农民放弃这块田。对我们来说，收多收少都是无所谓的，不能让我们闲呆着。我们只能采取人力轰鸟的笨办法，从清晨天麻麻亮到晚上擦黑，都派人轮流值守。坚持了个把月和鸟战斗，直到割完麦运回场地。就是这样还是让鸟连吃带祸害损失了不少。

尽管清查“516”如火如荼，表面很紧张，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把这个当作多大的政治斗争，不像过去搞反右那样。抓出来的“516”就好像没事似的，照样都是嘻嘻哈哈。宿舍里最热闹的就是抬杠。说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对的说，应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魔代表的是造反的，道是玉皇大帝。争辩者反驳：道是如来佛，孙猴子翻不过如来佛的手心。又有人反驳，如来不是道，道是如来的下属，可以翻过来，如来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又有人争辩说没有绝对权威，魔是人民群众，权威也能打倒。“哈哈！

‘516’就是要造反……”。激烈的争辩，让搞政治的老师感到要出格，赶忙岔开问道：不管魔和道谁大谁小，到底什么是魔？魔和鬼有什么区别？众嘴纷纷：“魔就是鬼，魔鬼魔鬼嘛！”“魔是鬼头，要不鬼怎么叫小鬼。”“魔比鬼有本事，道行深。”“那么，魔就是经过深造了的鬼。”“不对，不用上学，魔是鬼中杰出者，打拼出来的。”“不，他是不择手段，踩着别的鬼爬上来的。”有一人突然语出惊人：“你们看魔字怎么写，魔就是长了麻子的鬼！”大家轰然大笑，一场抬杠也就收场了。仔细想想也很有意思，这种调侃和起哄，不也是一种深层的对劳动改造的满不在乎么？似乎还有点影射什么。

1971年9月份，我被批准回京探亲一个月。回到学校，看到四处冷冷清清，学校留守看摊的没有多少人。我也没住在校内，徐宏勤回到小学之后，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大单位里，

借了一间平房住。我休假还不到一个月，干校就来电报催我回去，说传达重要文件，参加学习讨论。回到干校之后，传达林彪叛逃的“913”事件，的确令人震惊。我感到惊愕的是，抓“516”要我们交代的重点，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林彪。党章上定下的接班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成了十恶不赦的敌人，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学习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成了我们干校的主要任务，清查“516”早就扔到了一边去了。

1970年，地质学院决定外迁到湖北，湖北省选址在荆州。1971年北京派出的军宣队，也要换成湖北派出的军宣队。原来北京的军宣队是空军政治学院的，本身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只是林彪一套的“三忠于四无限”贯彻执行得特别好，多数是政治指导员出身，能说会道（“913”之后他们的下场极惨）。相比之下，荆州军分区派出的军宣队，都是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兵出身，他们对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根本玩儿不转。军宣队的领导于是决定，把“五七干校”搬回湖北，便于管理。1972年春节过后，我们就忙于准备搬家。他们也不考虑经济损失，不考虑搬迁的复杂性，硬是要搬家。结果是折腾得刚刚在湖北沙洋落脚，形势发生变化，军宣队指挥不灵了，一个一个灰溜溜地溜走了。

湖北沙洋原是公安部所属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文化大革命后认为不安全，撤销迁到更远的大西北了。方圆几十里的农场，安置了北京湖北几十个单位的“五七干校”。我是第一批打前站到达沙洋的人员之一，我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安置全部人员的住宿。在这里只能是搭建临时的窝棚，不能再像江西那样建设半永久性的平房。又是花了不少的钱。购买了毛竹、苇席，搭成了圆拱形苇棚，上面再糊上泥，实际就是当地放鸭子人住的棚子，称为鸭棚。我们刚去的时候已是初夏，盛夏棚子里是40度以上的高温，人们只能在外边用雨布塑料布扯起凉棚休息。夜晚午后再回到棚内睡觉。

我在沙洋干校基本上没有住在农场，我被派在沙洋镇上舒服地住在镇招待所里，接待从江西到武汉，再坐船到沙洋的人员和行李物资。江西过来的人员分成了数批，多数人坐汽车到干校农场，也有少数的坐船过来，下船后用卡车送到干校农场。大宗的行李是从火车货运到武汉，包驳船运到沙洋，我再找马车拉到农场。我驻守在沙洋镇差不多有两

个月，完成了全部的物资和行李的转运工作，回到了干校农场。这时候派来的军宣队已经悄悄地撤走了，干校归在迁到江陵的地质学院校部直接领导了。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八月份我申请回京探亲。到了10月，我写信问干校，说我要回去，他们回信叫我别回去了，这里的人都要回北京，那里没法过冬。我的东西他们会给我运回来的。干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没有结业式，没有鉴定，没有任何说法，作鸟兽散。我想，所有的上千个“五七干校”大概都是如此。至今，官方文件从来也未提起这个劳民伤财的“五七干校”。连公开的文艺作品，也没有涉及过这个题材，看来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五七干校，将来有谁来书写这一笔呢？

现在有时候，我们退休了的人碰到了一起聊天，其中有些去过干校的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经过干校学习深造的，我们比你们（指没去过干校的人）学历高，我们是“高材生”，说起来有些调侃。抛开政治的层面，政治的纠缠，那段生活还真是令人怀念的。

## 为什么大学都要迁出北京？

1970年，北京的各个大学，都在外地寻找地方准备搬迁，按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战备的原因。中国和苏联闹僵，老要反对人家的修正主义，边境上又有摩擦，害怕真的打起来，北京各方面都做着备战的准备。各个大学和主要的科研单位都计划着首先外迁，我们1969年去干校是人员疏散的先行一步。1972年，中苏间的紧张局势有了缓解，所有各单位的“五七干校”的人，大部分都撤回北京，北京备战的气氛也放松了许多。

我们回到北京只是无事的呆着，没有教学，没有科研，在干校练就了做木工的手艺，没事打柜子做沙发，再有就是“攒”电视机。后来我们和张家口探矿机械厂联系，承担了一个研究和设计钻机试验台的装置，总算找了一些事干。到了1975年，院长高元贵与湖北省委交涉了很长时间，敲定了学校搬迁到武汉市，新的校址算是落实了下来。原定学

校的大队人马6、7月份就要迁到武汉，因为河南大水灾，京汉路中断，直到9月由副总理李先念督办检查，一个死命令，我们多数教职工像赶鸭子，轰到了武汉，夫妻都是地质学院的双职工是举家搬迁。新的学校刚刚开始基本建设，涌到了武汉的人被分散到三四个安置点。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要把那么多大学迁出北京。原本认为大学搬迁是为了战备，现在似乎没有那个必要了，但是更迫不及待地要把大学搬走。一个首都应该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为什么就容不得几所大学？海淀区是大学最集中的区域，各院校都在忙着搬家。清华搬四川绵阳，北大搬陕西汉中，中国科大搬安徽合肥，师大要迁到某省与该省师范学院合并，农大搬延安，矿业学院搬华蓥山，后改到江苏徐州，石油学院搬山东东营，林学院搬到西双版纳，钢铁学院搬楚雄，水利电力学院搬邯郸，机械学院搬咸阳，建工学院搬武汉……等等。不能再一一列举。这种搬迁难道没有慎重考虑，是随意做出的吗？

有几句经典的话我记忆犹深：“农业院校办在城里，那不是见鬼吗？”“工科学校就应该同工矿企业结合到一起。”当然这就是最高指示。那么非农非工的院校呢，不是照样也要外迁搬走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猜想北京有那么多大学，就会有思想活跃的青年人，就会有难以预料的出格的事情发生。这会使老人家坐卧不安，担心风云变化，担心设计的理想目标不能实现。当然大学必须外迁，以绝后患。最高领导人的意愿，那些听命者能不遵旨照办吗？1975年迫不及待地催促大学外迁，只能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赶紧到武汉去，正值河南发大水，驻马店地方两个水库的水坝冲垮，西平和遂平两个县被夷成平地，据说死亡人数达到二十多万人。京广铁路中断有一个多月，刚一恢复通车，铁道部受中央指示，通车的第一趟列车派做专列，仅只拉了我们一个学校的人，包了全部的卧铺和硬座席，直达武汉，沿途不上下任何其他别的旅客。如此大的水灾，没有一点的公开报道，但是天上的卫星是有眼睛的，人家外国会怎样看待你中国政府。列车夜间路过灾区，路基刚浸泡过水，列车行进极慢，靠着车窗透出去的灯光可以看到，路基两边全是水，远处是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停靠在小站的时候，车站上有许多要想

上车的灾民，车门紧闭着不开，车下哭嚎着也没有用。我们好心的同志对列车员央求，就开一下车们吧，他们都会是短途到前面下车，投奔亲戚的。列车员为难：“我不是不想开门，门如果打开人都会涌上来，列车就别想前行了。”列车本来就是临时停车，列车员也无权让人上车。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可怜的灾民无助的哀求。

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无视那样大的灾情，把一个大学的搬迁，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不设法去救助灾民。究竟是救灾重要呢，还是强制我们赶紧去武汉重要？难道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

然而，我们到了武汉却是无事可干。总共安置了四个点，前三个点大家都是闲待，干等着。第一个点是全面接管合并了的武汉地质学校，第二个点是整个借用了武汉教师进修学院，第三个点是挤占了华中农学院的一些校舍，农学院遵照“农校不能办在城市里”的指示搬到下面去了。第四个点是新校址，分配从事基建工作的人员，都到建设工地上岗。我们系留在了地校，整天的闲扯天、吹牛、打扑克、下棋、上街瞎逛，也真是无聊透顶。非要我们赶到武汉，难道为了就是为了这样闲待着？就这样，我们从1975年的9月份闲待到第二年的3月。10月份的时候，受湖北教委的指示，学校派人下到地区县招生，由公社和生产大队推荐，派去的人做文化考核，县里批准。推荐的考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部分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略好一点，学了一些高中课程，最差的只有小学低年级水平，答卷： $1/2+1/2=2/4$ 。这种学生还不能不要，一定是大队或公社干部的子女；你如果不收，别的好一些的考生，也别想收。另外辽宁交白卷的张铁生的事例，也给了我们招生同志一个警钟，文化考核只不过作为摸底，不能作为录取标准。

3月份之后，我们一些人有事可干了，去帮助这些新招来的学生，补习最基础的数理化课程。只有个别辅导，手把手地教。就这样还是有个别太差的，什么也听不明白。这就是毛泽东要求的改革的招生制度，这样招来的学生毕业后能干什么？哪个用人单位能用？难怪“四人帮”倒台以后很多单位，对这些称之为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生，一律回炉学习，重新考核再分配工作。这样招来的学生，稀里糊涂地学习，没有基本的基础知识，没有高

素质的专业技能。培养这种学生的大学，的确在不在城市也无所谓，哪个小地方都可以办学。大学里不用什么教授副教授，也不需要科学实验，更不需要科学研究，只要传授一些劳动技能就可以了。这纯粹是毁掉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我们院长高元贵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坚决顶住，不在一个小县城里办学，最后选定武汉。在那个文革的极“左”年代里，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为地质学院的前途费尽精力，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迁校的热浪仅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发生了一些逆转。最先是北京化工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借口燕山石化总厂和首都钢铁公司发展的需要，按照谢富治向上面的请求，暂缓迁校，后来索性不迁了，搬出去的一些物资（主要是桌椅板凳床）也扔在外边不要了。其实化工学院还没有行动，但主要的教学楼已经移交给中国科技文献馆，严重影响了化工学院的恢复招生和教学，但是学生宿舍和职工宿舍却没有被侵占。农口的三个学校却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农大给弄到了陕北，人员在当地不少得了克山病。这是一种心肌受到损害的严重心脏病，与地质条件和土质有关。而且农大还死许多引进的属于珍贵品种的牲畜。林学院到了云南，也因为水土不服，疟疾肆虐，人员也病了很多，另外也没有合适的地盘搞基建。农机学院到四川，挤占四川农学院。四川农学院本来地盘也不大，也要它向下搬，人走家属不走，两校人员摩擦不断，农机学院又不得已迁回河北邢台，折腾得大伤元气。这时候主持农口方面的副总理王震，毫不犹豫批准三校都全部回北京。王震的脾气是不管不顾，那些把持着教育口的迟群谢静宜们，不敢有任何阻拦。三校在外头折腾两三年又回来了。副总理万里主持铁道部，没有让北京铁道学院走，倒让唐山铁道学院搬到四川峨眉。它真是躲祸得福，唐山铁道学院原址在地震中遭受惨烈的破坏。后来万里当了安徽省委书记，将中国科技大学留在合肥。科大在北京原来与中科院各研究所紧密联系，利用科学院的最先进的设备和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办学、开展学术活动。而在合肥脱离了这样的条件。原本是可以和北大清华平起平坐的，现在下滑到二流地位。

高等学校因为外迁和停止教学，发生侵占校园，引发了许多的矛盾。一个惊动了周恩来总理的事件，就是人民大学校园之争。中国人民大学没有外迁，但是不知是谁人作主，



把第二炮兵司令部迁到人大，在人大的大操场下秘密修建了一个地下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的修筑费用，比人大几个教学楼合起来的还要高。要让二炮搬出去也确实是很困难的。问题提交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说，人民大学不能停办也不能搬走，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不能有变动。二炮不论再花多少钱，也得另找地方搬出去。这个事情由总理敲定，人民大学要回了被占的地盘。

石油学院迁到山东胜利油田，东营旁边，一个寸草不生的海边滩涂之地，周围没有村庄，没有田地。石油系统有钱，在远处买土运过来种树、种草、种花，建立植被绿化校园，这是基本建设里一笔巨大的花费。功夫不负有心人，校园的小气候得到改变，恶劣的环境大大改善。刚开始的时候，潮湿含盐的空气使许多仪器设备损坏，后来绿化再加上有效防护，潮湿锈蚀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这样的地方无法得到优秀的生源。他们多次呼吁山东只作为分校，恢复北京本校。余秋里坚决不准；文革时他在石油学院批斗，永远耿耿于怀。后来余秋里实在管不了了，石油学院不仅以北京为校本部，而且在昌平购地，建立了新的石油学院。矿业学院先到四川，遭遇了像农业大学一样地厄运，不少人得了克山病。他们重新迁到徐州，江苏省给了特别的照顾，在徐州建起了当地标准最高的建筑和花园式的校园。后来矿业学院在北京恢复大学本科专业的招生。原校园让北京语言学院占了多半，但是它有很大的向北发展的空间，逐步扩大，有了与语言学院差不多的地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地质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分别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这三个学校都在北京以外，建设了规模很大、设施不错的当地一流的学校。为了反映一个学校两地并存的状况，在校名后打一个括号，注明北京或外地。例如，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这是教育部下属的三个特例，以一个统一的校名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院校（原来都是部直属院校）。这三个大学都冠有中国的名头，都是一个学校分为两地，各自是独立的实体，没有总校和分校之分。教育部分别下拨经费，直接管理，党的关系则分别由所在地的党委管辖；对外可以用统一的名称进行国际交往，算作一个学校。

地质学院则代表了大多数搬走后又重新杀回马枪的学校的曲折经历。1978年，迁出去的学校都开始了招生，但是老教授们，像地院那些知名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称科学院院士），都不能跟着迁校离开北京。于是1980年在北京成立了研究生部，恢复高考的同时，1981年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国家教委认可，北京市也认可，头两届的学生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先是硕士研究生，三年以后有了硕士学位的，又从他们中招考博士研究生。从地质学院开始，迁出去的各大学都纷纷在北京成立了研究生部。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称研究生院。各学校实际上是偷梁换柱式的往回走，但是各个学校又有各自复杂的情况。一些学校前脚走，地盘立刻被别的单位占据了。若是学校的上级单位占了，或是它责成下属的其他单位占了，那简直是没辙。地质学院的地盘，除了地质部航空物探大队、遥感中心、计算中心、石油局及石油地质测试中心、地质印刷厂进驻之外，参与瓜分的还有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铁道兵新兵教导团、海淀区政府及一些小单位等等。地质学院成立研究生部之后，外单位逐步清退，而地质部系统的单位总共占据了地院三分之一的面积，成为永久的住户，地质学院称之地质大院。后来地质系统各单位相对集中腾出来一些房子，地质学院得以开展各项教学和科研活动。到1980年代末，地质学院经过主管单位批准，研究生部扩大成研究生院，北京其他院校也都这样。1985年，随着对人才的需求，要求有更多的大学生。地质学院先是试着办本科的代培生，后来又逐渐纳入北京市的招生计划，招收计划内的本科生。高等学校的外迁不明不白地经历了一个轮回，又重整锣鼓开张了。没人说当初为什么外迁，如今又为什么回来，只是默认了先是“合理”，后又是合法的存在。九十年代后期，全国各高校都扩大招生，北京市接受了更多的扩招任务。因为北京的教育资源雄厚，理应多承担一些。这些恢复了招生的老学校，在扩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是所有的外迁的学校都可以回来。有的学校在北京已没有一席之地，想回来也没有办法。像机械学院，地盘给了《人民日报》社，没有办法再回来了。建工学院因为北京市把建工学校升格成建工学院，还搜罗了原建工学院的在京人员，原建工学院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恢复了。原水利电力学院，因为水利与电力分家，电力部主管把电力学校变成北

京电力学院，原水电学院人员就全部归了华北电力学院。华北电力学院，北京一部分，河北一部分，两地很近没有分家，算是一个学校。类似以上的还有一些学校。至此，十余年的迁校的动乱，算是划了一个句号。将来只有让历史来评判这个外迁高等学校的荒唐之举。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使北京的高校从文革前的54所，增为100多所。在校的学生总共翻了约十倍。北京才真正确立了作为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从邓小平开始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国家的富强，经济实力的增长，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在于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毛泽东可悲的短见，就是不尊重知识，不重视教育，不重视人才。他以阶级斗争斗争为纲，把国家拖到经济崩溃的边缘，把科学教育摧残到毁灭的地步。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这一痛苦的过程，感谢拨乱反正，感谢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9年，我是第一批被安置到北京研究生部工作的，回北京的首要条件必须是单身职工。跟我一起回来的还有杨惠民，我们名义上是作为李世忠教授的助手。在这之前我在山西侯马支援当地打水井一年多，没有参加1976—1978年招工农兵学员的教学。此后李教授招了研究生，我一方面帮他指导研究生的实验，一方面操办了地矿部探矿司的钻探总工培训班。

这就是充分利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利用我们在北京信息获取的有利条件，利用我们与主管部联系方便，更易了解需求。我们这样做有利国家，有利探矿事业，也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提高，不荒废业务。这也是为我们逐渐恢复本科生招生，创造有利条件。地质矿产部主管教育的不让我们招本科，我们办班总可以吧。1986年我们又为煤炭部、冶金部、化工部、建材部培养本科人才，由外地的招生办按当地招生录取线，录取考生，发录取通知。教育经费按人头由各部出，学校向各部去要。北京市教育主管认可，学生可取得正式的本科学历。这样绕开了我们的直接主管——地矿部教育司。我们逐步冲破不准招本科的限制，造成既成事实，地矿部也管不了了。

大约是1990年，地质矿产部的部长宋瑞祥，在部党组的会议上说，武汉地质学院招收

的本科大学生，每年毕业的学生已经足够使用。北京研究生部只需要培养高级的地质科学人才，不能再招本科大学生。这就是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北京招本科生。宋瑞祥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打算将中国地质科学院迁入地院，地科院在百万庄腾出的大楼，地矿部的部分机关可以搬过去，这样西四地矿部机关就松快得多了。宋瑞祥派了他的秘书到研究生部，宣布了他的这个决定，研究生部的领导们就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老师们听到就炸了窝了，纷纷议论表示不满。煤田地质系的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李宝芳，通过政协常委会反映学校老师们的不满意见。宋瑞祥得知地院的老师上告，亲自出马到地院来，说是听取意见，解释部党组的决定。实际上想施压。李宝芳等教授质询宋瑞祥，你们报请国务院了吗？地质学院的去留你地矿部无权决定。宋瑞祥恼羞成怒，拍起桌子，说，你们还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闹得不欢而散。后来有的老师通过关系，把意见反映到朱镕基副总理那里。朱镕基派人调查，作出批示，制止了宋瑞祥的一意孤行。朱镕基对宋瑞祥原本就没有好印象。两年后朱镕基出任总理，国务院机构改革大调整，地矿部变成国土资源部，宋瑞祥改任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级别降了许多。他的仕途也算是到了末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地质学院更名“中国地质大学”以后，武汉和北京各自独立，统一使用这个名字，此时还是地矿部部属。进入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各学校都扩大招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达到超过万人的规模。进一步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有高等学校和所有的高等职业教育，都划归各地教育系统领导，原部属的重点院校由教育部直接领导。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都不仅恢复成完全与文革前一样，而且都扩大了规模和专业范围，一方面保持了原学科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多个文理学科，成了多学科的综合理工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走向了新阶段，彻底摆脱了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的框框。■

此文选自唐振权先生的《拾珠串链——我的记忆碎片的整理》一书（2012年，北京，自印书）

【资 料】

## 戚本禹与北京航空学院等校同志的谈话

1967. 01. 17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组织的同志出席）

北航红旗，我让你们派一百多人去天津，去了吗？（答：正在准备，我们去二三百人，可以吗？）可以，不要你们自己去，你们组织一下，别的学校也去。（北航红旗：我们准备步行去）好嘛！步行去站得住！（北航红旗：我们让解放军跟我们一块去）行，行，让他们跟你们一块。（北航红旗：我们要军训）这并不矛盾。

今天是一个预备会，明天中央文革要开一个比较大型的会。江青、总理听你们讲意见，主要听你们讲，你们讲一下你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对于夺权，对于左派联合等多种问题都可以讲。

北京的运动已经不如上海，你们感不感到惭愧！我们感到惭愧！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都落后于上海，有差距。（众：差一大截呢！）上海左派组织联合起来，夺权，把市委的权都夺了。可是北京的左派组织还有分歧，有原则分歧，有非原则分歧，方法分歧，吵得不可开交，影响了集中矛头。你们都还是造反派嘛！为什么联合不起来，这是很大问题！伯达同志推荐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你们学了，为什么效果不大？（有人讲：根本没有效果）为什么？（众：没好好学！）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负责人），你们要了吉普车？还分钱！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你们是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你们搞些自行车还说得过去，你们少坐些小轿车好不好！你们写大字报用红绿纸，为设么不用报纸？文化革命的经费学校都有嘛，你们再向人家那儿要，怎么行？

小团体主义！北京落后了。与上海为什么有差距，你们想一想。那一天开那个会，我

没有去，十万人只去了一半，五万人，左派联合都联合不起来，不用说全市了。

要说老实话，毛主席说嘛，不说老实话是要吃亏的。明天你们一五一十地给伯达同志，给江青同志讲。

（北航红旗在下边问，我们要开始军训了，可以吧？）可以，我同意军训。北航最近出了一张大字报《谈谈孙悟空》我看了看，是攻击中央。（北航红旗，他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

（有人问陈云问题）陈云问题你们自己可以作出结论的，陈云你们可以提。

（当一个“全国性”组织问戚本禹时）全国性的组织我一个也不承认，总理、江青也是这样。一个兵、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就组织“全国工农兵革命造反总部”，这怎行？全国性组织多如牛毛，你们几个能代表全国新闻界吗？■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宣传组

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

## 【资 料】

# 造反就是要夺权

1967. 01. 22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通讯社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

什么是造反到底？造反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造反就是夺权斗争。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震撼世界的《共产党宣言》里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无产阶级“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

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

不造资产阶级的反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造反不夺权也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于刚刚要起来造他们反的革命群众，就害怕自己的权势被夺走。他们出自反动阶级本能的敏感叫嚷：“要夺权啦！”对了，我们就是要夺权！我们是大无畏的革命造反者，我们就是要把被那些反动家伙篡夺去的一切权力统统夺回来！

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着一些党、政、财等领导权，他们阴谋篡党、篡政、篡军。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几乎统治了全部的文艺机关和文艺团体。在文教单位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纠集着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学校和文化机关。在工矿企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资本主义的经营，妄图把我们的企业拉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道路。

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竭力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伙同一批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地、富、反、坏、右分子，对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把他们所控制的地方搞得乌烟瘴气。这种情景，难道不正如毛主席所告诫的那样，“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利用他们掌握的党权、政权、财权，欺骗群众，打击革命派，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试问，不夺回这些家伙手中的权，岂不是要断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这些家伙的阴谋得逞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革命造反者。这批革命闯将，紧紧跟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风里浪里来锻炼，围攻迫害不动摇。革命左派的队伍越来越大，越战越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

子正在联合起来，汇合成滚滚的洪流。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的斗争，经过半年的舆论准备，彻底地批倒了“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混账谬论。大破“保”字，大立“革”字，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逐渐联合起来了。“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权是到了非夺不可的时候了，此时不夺，更待何时？

“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撤换下来，不就成了吗？为什么非要去夺权？”这是糊涂虫的逻辑。这种人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铲除资本主义复辟温床的大革命。如果不发动起亿万群众，不打他个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不来一个自下而上的大夺权，怎么能彻底打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死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僵尸的顽固分子？他们的幕后保护人又怎么能给揪出来呢？同时，不来一个自下而上的大夺权，又怎么能锻炼出一批坚定的革命造反派，使他们具有反修和防修的双重本领？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不能是靠别人恩赐的，要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权就要靠革命造反派自己来夺。

“夺权的字眼太刺耳了。”是的，革命就是暴烈的行动，哪里有温良恭俭让的革命？否则，就是改良主义，夺权是阶级斗争的激化，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掌的权，本来是从无产阶级手中篡过去的。有的我们一直没有夺过来，或者没有完全夺过来。他们是不会轻易地交出权的。夺权，就是要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彻底地肃清他们的影响。夺权，就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要把一切权力紧紧地掌握在革命派的手中。“夺权”这个字眼，在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听起来很刺耳，但它最明确不过地说明了事情的本质。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把中间群众吓跑了，不策略。”又一批“策略家”跳出来大叫大嚷。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就是一切权力归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最终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革命造反派团结中间群众，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是要通过斗争来达到的，不能搞折衷，不能搞调和。中间势力和保守势力，他们大都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的。当他们还处于中间和保



守的状态，决不能讲平均权力，否则就不能真正把权夺过来，不能真正把权紧紧地掌握在革命派的手中。无产阶级的策略是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出发的，绝不能牺牲原则讲妥协。

“夺了权，我们领导不了。”同志，你也未免太没有出息了。你相信群众吗？你相信党吗？革命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毛泽东思想有无限的威力。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踢开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除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老框框，只会把工作做得越好。君不见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紧紧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紧紧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抓革命，促生产”是做得何等好啊！君不见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一旦夺了权，报纸又是办得何等的出色！收起那套无所作为的论点吧！

“人间正道是沧桑。”上海工人阶级给我们树立了夺权的光辉榜样。如今革命形势大好！夺权的冲锋号已经响彻祖国四面八方。

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坚决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原载 1967 年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

## 【资 料】

# 中央首长关于朱成昭问题的指示

1967. 01. 23

(一) 1967 年 1 月 23 日陈伯达批示(王广宇传达)

过去关锋、戚本禹同志受伯达同志委托和你们谈，过去关照你们，现在还有责任来和你们打招呼。听说你们要搞中央文革，还要斗到底。

一定不要这样，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是无所畏惧的，招呼你们是为了照顾你们。如果你们不听，那就要陷入泥坑里去，那是自作自受。

(二)1967年3月5日凌晨戚本禹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志讲话

朱成昭，我刚才建议他闭门思过，学习文件，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检查，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我们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当然他坚持自己的错误不改，那就没办法了，他要同我们决裂，我们有什么办法。

他们要夺权，如果是要夺你的权可以嘛！你的权，就是要夺嘛！

今天茅屎坑边沿的当然应当帮助他，如果他转化为敌人，就不能温情主义。今天是我们战士，明天他跑过去了，就要调转枪口向他开枪。对于动摇的不能把他推过去，如果他真要跑过去，毫不犹豫地就开枪，把他打死(戚本禹同志手一甩)。阶级斗争就是复杂的。

我们要能顶住冷空气的侵袭，有的人就不行，弟弟给他吹点冷空气就动摇了。女朋友，再有些其他的人给他灌点，就耳软了，象喝了迷魂汤，分不清天南海北，不知家在哪里，立场转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

(三)1967年4月9日凌晨4—6时戚本禹接见中央戏剧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红旗文艺兵团的讲话

而我知道不只在中央戏剧学院，而且在原地质学院东方红的负责人朱成昭的问题和叶向真有关系。当时我点了他。我们费了很多精力培养的地院东方红旗帜，朱成昭的错误和她有关系，给朱成昭散布了不少错误的东西。

(四)1967年6月25日戚本禹给王大宾电话指示

对朱成昭要批倒、批臭。

(五)1967年7月7日周总理第一次指示

主要精神是抓回朱成昭。我们说派往广州四五个人。总理说：“派七八个人”。后傅崇碧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朱成昭从广州抓回来。

(六)1967年7月14日傅崇碧司令员传达总理第二次指示

1. 不要审问，要整风，不要让他乱跑。（傅司令员：费好大劲抓来，不要叫他跑了），要让他学习毛著，学习老三篇。要批判，要斗争，不要武斗。（傅司令员：总理担心这一点（指武斗））。

朱成昭是有严重错误的，中央文革不是已经打了招呼了嘛！要注意他的活动，要整理他们的材料，随时汇报。

2. 地质学院里边可能影响有一点，要消除。反对中央文革嘛！你们可以搞他，不要冷到那里，要批。

3. 朱与叶向真不要搞恋爱。叶向真弄回来也准备搞她。

（七）1967年7月29日晚陈伯达与王大宾谈话

不一定抓，要让同学把他看起来，让他还继续表演。

（八）1967年8月2日关锋同志在人大礼堂谈话记录

田春林：关锋同志，我是地院东方红公社战士，我叫田春林，我向你汇报一下我院的情况。我院前段对朱成昭进行了批判斗争，但是阻力很大，阻力主要来自朱成昭及其追随者和他的影响。他从广州回来以后还策划成立了新东方红公社，被同志们斗了一顿。

关锋：怎么你们连朱成昭都对付不了，朱成昭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他背后有人，你们要追，是谁让他那样干的。

田春林：有人说目前大方向是批判，目前批判朱成昭是背离大方向。

关锋：在你们学校批判朱成昭是大方向，不违背大方向，和大方向是一致的。

田春林：朱成昭影响在革委会中有反映，参加新东方红公社的人就有常委。

关锋：批判朱成昭阻力根源恐怕在你们革委会，解决办法依靠发动群众。……

（九）1967年8月4日戚本禹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讲话摘抄

我们曾经支持过一个学校，他们当时确实很革命的，受到很大压力而没屈服，他们当时以为毛主席不在（北京）准备上山打游击，后来报上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我们发现了，支持了他们，但后来变成极左派，变成孤家寡人，现在在做检查，朱成昭大家都是知道的，

(注：朱曾是首都三司主要负责人)曾是一个很好的造反派，后来变成了一个可悲的角色，他犯了错误，敌人用各种卑鄙手段拉他，乃至携款逃跑……

(十)1967年8月9日凌晨陈伯达、谢富治接见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聂守红等谈话摘抄

谢富治：王大宾那里我要去，没讲明白，原来是要我去支内的，内部还有两派，你朱派还是无职有权的。朱的思想在总部内部搞不清。韩爱晶：据说他们有一个计划，北大、清华都不搞了，专门搞北航，明天大会上就专门对我们了。

谢富治：那不都要搞乱了？

(十一)关锋同志的电话指示

田春林同志：

听说你们那里因为地院革委会确定朱虹、黄占起两同志随我去一趟的问题有很大争论，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争论，妨碍掌握斗争大方向。既然争论很大，这一次你们那里可以不去了。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把朱成昭批深批透。你们那里批判朱成昭和大方向是一致的，八月二日你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讲了几句话，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关锋 八月九日 ■

北京轻工业学院红鹰兵团

主办《红鹰》第27期

1967年8月31日

## 【资 料】

## 朱成昭及其同伙反动言行的第一批材料

1967. 04. 7

地质东方红

## 一、反对中央文革

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攻击、反对、抵制是由来以久的、全面系统的，非常露骨和恶毒。

1、朱成昭于 66. 12. 18 对联动头头周××（北大附中）、丁××（农大附中）、彭××、顾××（北大附中）说中央文革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我党历史上，每反右，必定出现一次反“左”运动。

2、1967. 1. 22 朱成昭说：“我们反对什么？反对中央文革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和政治路线。在贯彻执行政治路线方面，文革小组没有能够坚决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3、1967. 1. 19 朱成昭说：“北京要变成第二个北大了。”又说：“中央文革已从不信任群众到害怕群众，到压制群众。”

4、他们认为中央文革有很多问题蒙蔽了毛主席，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

5、有一时期外面谣传主席批评了中央文革时，朱说：“幸亏我们没有紧跟中央文革。”

6、朱说：“中央文革运动群众。”

7、67. 2. 28，朱对彭××说：“中央文革掌握我的材料，我也掌握他的，他抛我就抛，他整我，我就整他。”

8、程××讲：“朱成昭掌握了中央文革的材料，他还能联合许多单位和中央文革干，现在外面形势很紧张，人心所向不是你们（指反朱派）。军队如能闹，军委几个老师一闹，

把各军区割开来，中央文革就完了，所以中央文革不敢反朱成昭的。中央文革手中会有最后一张王牌，就是军队，但是军队是有问题的，各军区可以割开来。内蒙，中央只能把军区司令骗来，下面士兵是保司令的，根本不会支持造反派。”

9、“军委面里问题很大，为什么军委会议开了几天，中央文革就不让开了，而且把人都撤了。”

10、2.28 朱对彭××说：“红旗三期社论的发表是我们，也包括你们（指联动）奋斗的结果，是我们的胜利，出社论说明中央文革出场了，如果再不出，这就没法收场了。”

11、2.28，朱对彭××说：“军委是司令部，中央文革只不过是参谋部，不能把中央文革这个参谋部都说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盲从。”谈到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时，朱说：“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我才不干呢！”“中央文革根本没有什么原则性”。一次有人问，中央文革，有些地方不符合十六条精神，江青却说：“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可以约束自己的。中央文革就是实用主义。”

12、他们把中央文革分成几派，说××，××，×××是毛主席一边的……，另一派是××，××，×××。

13、“中央文革掌握政策就是没有原则，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你看，贺龙原来也只轰一轰就保，现在你看把他打倒。她就是想用群众来轰你，杀你的威风，然后就保你。陈毅你们，前一段有牢骚，中央文革就用群众轰一轰。”

14、在最近，与北大的冲突中，他们认为是实现其“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重新排队”的理论的时候。有人说他们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中央文革已经制止了，他们说：“如果不制止，中央文革就该完蛋了。”

15、有人对他们说：“我们与你们的分歧就在于你们反对中央文革。”他们回答：“中央文革有什么怀疑不得，反对不得，现在就是没有大民主。”

16、66.11~12，朱准备把地质部作为全国指挥部，说他用50台电话机指挥全国运动。

17、67.2，他们分析中央文革可能用几种手段对待他们：（1）中央文革下令把朱成昭

抓起来，但这样做比较被动，可能性小；（2）挑动群众把朱成昭抓起来；（3）让人把朱成昭暗地里打死。

18、说中央文革文过饰非。（按：这里难道说是一搬的认识问题吗？仅仅是对中央文革有意见吗？不是！他们对中央文革是有仇恨的）

## 二、反对攻击文化大革命

1、北大的反动分子杨勋、杨柄章的反动观点是人人皆知的：“文化革命是林彪的革命，是宗派斗争……是林彪的一派把刘邓的一派打下去。”而在 67.2，朱成昭们认为不能把杨勋当反革命，还说“要搞清一些问题必与杨勋他们联系，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到监狱。”

2、67.6.22，彭××问朱的出身，朱愤愤地说是：“革命黑帮”。

3、对彭说：“现在把老干部都斗苦了，都干完，陈伯达能领兵打仗？都是耍笔杆子的。”

4、朱认为彭、罗、陆、杨、陶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而群众是奴隶主义，中央点名嘛，就斗，就批，就抓。

5、抓彭德怀时，抄了彭德怀许多宝贵的绝密材料，曾放在我院地下室多日，朱成昭将这些材料全部看过了。

## 三、最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他们说江青同志根本算不上革命家，她是哪个阶级的？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一激动什么话都说，在北大把家庭纠纷都说出来了。（讲到这里，我们讲一句，朱成昭对毛主席一家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比陆定一的老婆有过之而无不及，语气之恶毒，令人发指，我们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公布。）

## 四、关于反对康生、杨成武、谢富治、周总理

朱等是最惯于搞地下活动的，据我们了解，它们是：

1、67；年2月北京刮起一股妖风，矛头指向康老，朱成昭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朱曾派刘××、刘××、万××等到高级党校与红战团联系，朱曾派郑××到北大找樊立勤要康老的材料，当中央文革批评之后，杨雨忠还顽固坚持：“康生的材料有什么整不得？”

2、地院《丛中笑》战斗队曾说朱成昭整杨成武的材料。

3、在北大孙蓬一公开贴出攻击谢富治同志的大标语前，朱成昭、杨雨忠一直把谢富治同志列在北大一边的。杨曾在东方红战斗队队长会议上公开冲谢富治发脾气。

4、朱成昭对总理从来是怀疑的，反对的。据揭发现在他们怀疑周总理是北大聂元梓的后台，坚决要把周总理拉下马，甚至怀疑到林总的头上。

## 五、对军委、对四个老师

1、朱不只一次的说：“四个老师现在满腹牢骚，被整得敢怒而不敢言。”

2、朱谈中央文革最后一张王牌是军队，但是军委有问题，各军区可以割开来，军队也能闹，几个老师一闹把各军区割开来，中央文革就完了。为什么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几天，中央文革就不开了，而把人撤了？”

3、朱讲：“四个老师的讲话很有道理，我很想找他们谈。”

4、朱与叶向真关系极为密切，来往频繁。主要是通电话，通叶剑英这条线，想从这里通毛主席。

## 六、与联动关系

1、67年2月25日，朱成昭通过陈广志（东方红办公室主任，朱的亲信）找到了联动分子彭、周、丁、顾等人，与他们谈了三个多小时，散布了大量反中央文革的反动观点，对联动分子讲：“你们是客观上反中央文革，我是主观上反中央文革。”甚至连联动骨干



也感到太露骨了，是地地道道的反中央文革，有的被吓得再也不敢找他来，找他了。周××后来谈与朱成昭的谈话不仅使他回到联动立场，而且又向前发展了，谈话中心内容是：

（1）中央文革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2）红旗四期社论证明中央文革要收场了，不收场就只好收场了，这是他们（联动）的胜利。

（3）联动要扒下，先别动。

（4）现在很多事情是颠倒的，要登高望远，十年以后，主席给我平反，二十年后，给我下结论，三十年后我掌权。

（5）中央文革不敢动我，因为我掌握他的大量材料。

2、67年3月18日彭××刚解放出来，立刻接到朱成昭的电话，说：“……你近来有什么新发现吗？”彭答：“我发现我自己有许多东西错了。”朱回答：“没想到你会有这样的发现，不过我感到是有了新发现。”对拉彭××失去了信心。

3、朱成昭叫郑文卿去搞联动，可是后来说，现在不搞了，说不定以后还和他们合作呢。

4、朱说江青以前把联动说成小月亮，后来一激动又大抓特抓，他们小小年纪就坐班房，带着美国手铐，越挣越紧，这和解放前有什么两样？他们天天唱：“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们此地不主张抓也没抓，送了十几个也要向上（中央文革）追责任。

5、朱成昭认为江青、中央文革在联动问题上犯了错误，放联动说明朱成昭是正确的。

6、四三派、四四派都不能掌权，应由老红卫兵（实指联动）掌权。

7、联动可能是左派。

## 七、关于叶向真问题

朱在叶向真问题上的手段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套，互相包庇，互相利用。

据四月六日田××在×× ××处讲：

1、朱和叶的关系很不正常，叶常深更半夜开着小汽车找朱，俩人谈话一谈就是一夜。叶是朱的贵客，谈话时其他人不准在场。

2、叶向真领头冲军事学院，我们支持了，实际上反错了，叶是保皇干将，黑材料是她自己整的，当时我反对，但是朱全力支持，说：“就是把叶向真打成右派，我也支持她。”

3、地院同学说，叶作风很坏，朱说：“你们别老抓她生活问题，我们现在要利用她，这次没有她还不行呢。”

## 八、关于与一些坏组织的联系

这方面线索是繁多的，但我们了解得很少。

1、我们了解朱与科大雄师、北大红旗军（应为红联军）、红联总联动等都有密切联系。

2、对杨勋、杨柄章、李洪山、谭力夫、赖锐锐……之流，认为不应该抓，并说要与杨勋联系，弄清一些问题。

## 九、对文化革命中其他一些具体问题

1、朱认为大串联太早了，北京运动落后是中央文革把人放跑了。

2、请示中央文革，学习中央文革同志讲话，朱认为是培养奴隶主义，这样中国还会出修正主义。

3、在“十二月黑风”时，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以红色保皇派的胜利，造反派的失败而告终。”

4、对军训是抵制的，他说：“军训对我们是有消极作用。”“军训对我们有害无益，对别人也如此。”

5、彭、罗、陆、杨是中央抛出来的，陶铸是中央点出来的。

6、516通知发表，朱等认为意味差，又要从中央文革抛出几个来，因为林彪与几个老

帅是一致的，要抓几个给老师出气，这就是新北大这次闹分裂中央文革的政治背景，所以北大是有大后台的。

7、认为大联合太早了，现在仍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 十、对十七年、三面红旗、反右斗争……进行恶毒攻击

1、他们认为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反对党的基层干部就是右派吗？可是就是不承认。

2、他们（指中央文革）对三面红旗就是死卡住不承认错，你们到农村去看一看，农民过得什么样的日子，现在讨饭的很多。

## 十一、朱成昭的作风

作风是阶级性的表现，没有超阶级的作风。朱成昭的作风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1、×××讲他们认为血统高贵（朱讲他对高干子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生活腐化得很，总是大吃大喝。谈情说爱。尤其朱成昭对别人像老子教训儿子，就是对杨育中也一样。

2、朱成昭高居地院西三楼，吃饭到饭馆，酒肉相待，田春林经常喝得醺醺大醉。有时朱成昭还请舞蹈学校的女同志跳舞给他看。彭××还见朱成昭喝牛奶，并叫人给他端茶送饭，不高兴起来还要训几句。

3、去年“十一”晚在颐和园互相吹捧说什么：“我看你（指朱）就是上天安门的材料。

4、蒋良才的女朋友是联动的，过生日，他们去祝寿。

5、朱曾说：“田春林是修味了。”但他要用田春林，因为田忠于他。蒋用国家的小轿车，国家的汽油，在学校练车，经常骑摩托，轿车出入，好不风流。■

来源：<http://www.71.cn/2012/0410/514625.shtml>（文革十年文献库）

## 【资 料】

我的检查与交待<sup>1</sup>

1967. 08. 15

朱成昭

原编者按：反革命右派分子、东方红的叛徒朱成昭八月十五日写的所谓检查与交待，是一株大毒草。我们把它翻印出来，供同志们批判，以便进一步把反革命右派分子朱成昭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

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宣传组，1967. 8. 15

## 第一部分 我对错误的认识

在这场空前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终于由一个革命造反派堕落到与中央文革相对抗，实质上充当了刘邓的一名打手，犯了严重的政治的立场错误。经过了中央首长和同志们的多次耐心帮助，至今才有所醒悟，从时间上来说，虽然已经晚了，但我还是有信心在下一阶段的运动中，努力学习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判，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挖掘其思想根源，吸收这次沉痛的教训，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我的思想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化革命开始——红旗 66 年第十三期社论发表止）

此阶段完全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中央文革是绝对的信任，虽然也有错误，但都属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的问题，大方向是正确的。

<sup>1</sup> 1967 年 2 月 4 日晚，朱成昭在地院做了检查，见聂树人：《朱成昭“反对中央文革”辩》一文的第三节朱成昭的“八大观点”。载《记忆》151 期，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二）。

## 第二阶段（红旗 66 年十三期社论起——一月革命风暴止）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东方红在地院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时我在大多数群众中的威望是高的，中央对我也是很重视的，信任的，东方红战士称赞我，外校的革命战友称赞我，雪片似的书信从全国各地向我寄来，什么“英雄”呀！“勇士”呀！人们用着感激的口吻，钦佩的目光对待我；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也写信向我表达爱慕之心，有的还寄来了照片，连余秋里、何长工、邹家尤、聂克等人也称赞起我来了。对于这些我不仅没有丝毫警惕，相反，却感到回味无穷，津津有味。这样，原来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很严重的毛病——骄傲自满就逐渐地充满了我的头脑。虽然口头上也说我们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是全体东方红战士的共同努力，但心中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心想，我领导的东方红走在全国运动的最前面，当然是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自己有能力，形势看得准，战略战术正确。就这样，我的骄傲自满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极端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耳中只能听得进颂歌，根本听不进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你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就这样，我在“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在一片歌颂声中，倒了下去！我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被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忘记了自己是如何翻了身；更忘记了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我不仅听不进来自群众中的反对意见，甚至连中央文革的话也听不入耳了。十二月整风时就错误地把矛头指向了群众。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我们就公开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错误，在我院这样做也是对的。但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全国和北京其它绝大多数部门还没有我院那样好的有利形势。而当时东方红是全国的一面旗帜，你提出这个口

号后，别人也跟着这样提，不仅对运动没有好处，相反却可能带来害处。所以，当时关锋同志批评我们那句口号提得不策略。这批评本来是很中肯的，但我却接受不了，不服气。一月风暴发生后，我就更认为当时在大串联的问题上我也有看法。

十一月份我们在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实现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的大联合。当时也受到了关锋同志的批评。同样我心里亦是不服气。

十一月-十二月份时，一部分老红卫兵多次去砸三司。对这个问题我向一部分老红卫兵作了调查，得到的答案是，绝大多数老红卫兵对三司的阶级路线不满。他们说三司是“狗崽子”当权；第二，老红卫兵认为自己最先造反的。三司是靠“打、砸、抢”起家的，现在三司是左派，他们却成了保皇派，心中不服气。当时，我认为这些小孩子头脑太简单了。

一次，田春林告诉我，三司某一同志到外语学校老红卫兵那里去做工作，回来后对他们印象很深，说他们的队伍如何如何整齐，如何如何团结，如何如何勇敢等等。我听了后也开始对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好感，又通过对部分西纠成员的争取工作，就亲身体会到老红卫兵（这）些人是可以而且是很容易改造过来的。只要多做一些政治思想工作，就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阵营一边来。

开始对于确定抓联动的一些头目，我也没有反对，是赞成的。后来，各个群众组织见了联动就抓。我自己也下过命令，一次就抓了十九个。人抓多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在抓人问题上我就逐渐地产生了想法。

这些问题也曾向中央文革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我对中央文革的绝对信任开始动摇了，我感到中央文革变了，不再向以前那样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了，其实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变的不是中央文革，恰恰是我自己。是我的感情开始变了，立场开始变了。

总之，在第二阶段，由于我在胜利后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极端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使我只能听得进颂歌，容纳不了反面意见。不仅我和群众的距离逐渐疏远了，同时，也和中央文革逐渐疏远起来，群众的话听不进，领导的话也听不进。虽然，这一阶段在行动上还是执行了文革的指示，没有脱离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这一阶段却为我今

后的犯错误打下了思想基础。就这样，我开始沿着一条危险的轨道滑下去。

### 第三阶段（一月革命风暴——67、7月）

一月革命风暴发生后，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场革命风暴面前吓得惊慌失措。“对运动评头评足，不适当地埋怨，无穷的忧虑”。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主席教导我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当时，我就是抓住了一些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如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做法，局部地方打击面过宽了一些，一些群众组织抓人抓多了一些等等，就把当时的运动看成漆黑一团，是走上邪路了。若不及时扭转，文化大革命就有夭折的危险。因此我就打算写大字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引起文革的注意，最好是能让主席和林总知道，并准备坐牢，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大字报没有写，但这却反映了我当时对文革是不相信了。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伯达同志的批示。批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听说你们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当时，我很想不通。因为我曾对杨雨忠说过：“若我们出大字报，保皇派也乘机向中央文革进攻，这时我们还要起来保卫中央文革。”我感到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就对我们作了这样一个批示，用对敌人的口气对待我们，压力太大了。因此，当晚的座谈会也未去。心中很是委屈，认为自己是满腔热情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后，就对我们下这样的结论，太片面，太听不进反面意见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伯达同志听不进反面意见，而是自己站错了立场，站到了文革的对立面，亦即站到刘、邓一边去了。因此，对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忠告和规劝以至关怀都听不进去，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与中央文革相对抗。

二月四日我作了一个所谓的“检查”，将我的全部错误思想不加批判地和盘托出。这个检查抽象地肯定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这个检查实质上是射向文革的一枝

大毒箭。更尤其是广泛传播，流毒非浅，必须痛加批判，以消除其恶劣的影响。当时我是认为自己的那些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作了一点很不象样的批判。但那只是不得已应付而已。心中并不服气。我深信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席和林副主席一定不知道，十分错误地把中央文革跟主席和林副主席分割开来。认为自己是受了很大的委屈。那时常呆在我房中的有相当一批人。我们时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着唱着就流泪了，时而又高声朗颂“黄山松”“唱着国际歌前进”等，显得十分悲壮。时而高歌狂舞，狂笑不已，时而以酒消愁，悲观失望……，这些充分地暴露了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动摇性，及革命的不彻底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动摇失望的丑态。在这种环境里，我不仅对错误的认识没有丝毫进展，而且又在不知不觉地更下滑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离开北京，到外地进行社会考察，当时打算①考察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弄清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②到西双版纳去进行社会发展史的考察。后一愿望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去年九月份时和肖力同志的一次谈话。那里她告诉我，我国很偏僻的地方毛泽东思想根本无法传进去。她说：“你若有机会能到那些地方去跑跑，一方面能长见识，另一方面中央也很需要那些地方的资料。我之所以选中西双版纳，还因为是那里从氏族社会——社会主义都俱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决定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出发。我离开北京，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对抗中央文革，进一步对抗革命群众，拒绝接受群众的批评与帮助。在济南和 上海找到了一些证实自己观点的东西，思想就更顽固了。

正当我在上海时，《红旗》67年第四期社论“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发表了，这实际上是毛主席发现了运动中的问题，讲话了。竟狂妄地认为第四期社论的发表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又听说戚本禹同志要找我，因此，我就回京来了。路上的心情是愉快的，以为自己的观点证实了。三月五日戚本禹同志接见了，出乎意料之外地指出了我“狂妄自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动摇性；并叫我闭门思过一个月，好好总结总结。我感到很失望，对他讲的那些话，根本听不进去。在闭门思过期间文革小组也数次派人来帮助我，启发我认识错误，江青同志及其他中央首长也常问起我，很多东方红的战友们也多次热情地找我



谈心。可是对这一切我都无动于衷。相反，我却把首长们的关怀教育和广大东方红战友们的希望当做显示自己身价的标志，更以为自己有理，认为是文革在找台阶下，更加不可一世。今天回想起来，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中央文革、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和其他首长以及东方红的战友们对我的的确确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苦口婆心的劝告，尽了最大可能的忍耐，加以等待，想使我认识到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中央首长和广大群众的期望，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终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十分可悲的地步！

在闭门思过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我的思想向更危险的道路滑下去。

1、在这个期间，我的一个想法渐渐地明确，这就是怀疑文革中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想法大致是这样来的：在去年九月份时，北航《红旗》因揪工作队长去炮轰国防科委，后提出了炮轰聂荣臻，到了十一月份韩爱晶要炮轰军委几个副主席的思想也更明显了，并且还要打倒聂荣臻。我以为军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委几个副主席（聂、陈、叶、徐）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了，炮轰和打倒是要犯错误的。但是北航《红旗》不仅未受多大的批评而且还是头号左派组织，得到文革的特殊看待，文革首长也常到他们学校去，而常常有些讲话又是说保密，不要外传。当时我怀疑后台可能是陶铸或康老。根据就是，从九月份开始到那时为止，中央文革每次接见总未看到陶铸和康老。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对陶铸和康老始终是有怀疑的。在陶铸被揪出后，我对康老的怀疑并没有打消。不仅如此，我怀疑康老、王力和关锋同志可能是一条线。这个思想，我曾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时向戚本禹同志透露过（当时未敢说出康老），立即受到了戚本禹同志的严厉的批评，他并警告我，若再继续这样想下去就要犯大错误。可是这个忠告我也未听进去。和蒯大富的一次交谈更使我这种想法坚定了。今年五一节时，听说主席在天安门上对王大宾说：你们地质学院要打倒几个老师，那怎么行呢！我就更确信几个老师是主席要保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在这以后，文革不仅未出来保，而且还暗示要轰。我想可能是由于康老等人起的作用。我想起以前曾听说外国有些要夺取政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即你要这样

做，我就顺着你的意思，但比你“左”得多，弄得你走向反面，失去民心，然后我就可以取而代之，夺取政权了。我就怀疑康老等人是在这样做。而江青和伯达等同志还被蒙在鼓里。现仔细想来，这就是我在六月份时和张海涛一次谈话时，一种未说出来的想法，但却是我那次谈话的主导思想。

这种怀疑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这是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狂热性的又一集中表现，是我头脑中的“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又一集中表现。看来似乎很大胆，实质上是完全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及受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主观上未很好地结合这些问题学习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又是极端的狂妄自信，听不进首长的忠告与教诲，听不进群众的批评与帮助，这样在这场空前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必然要犯很大的错误，栽大跟头。终于完全跌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

2、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我不可能完全理解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初期之所以能跟上主席革命路线，乃是由于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相一致。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形势的错综复杂，斗争的困难与艰巨。每当运动进入一个转折点时，我的思想总要发生一次动摇，发生很大一个倒退。特别是当运动触犯到本人和本阶级的利益时，就会起来对主席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满。在那一阶段我散布了不少污蔑、攻击中央文革的流言蜚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随着全国夺权斗争的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的日益白热化，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操纵挑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在这股武斗的妖风面前，我又被弄得惊慌失措。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将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其三，大批的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青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权？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

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

以上这些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暴露了我已经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地动摇，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发生了根本的怀疑，甚至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无比的崇高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极端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忧起来，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因此，就整天吃喝玩乐、抽烟喝酒、游山玩水、看节目会朋友，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喜怒哀乐之中，而不能自拔。有时想：还不如去越南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战死沙场，或去老挝打游击，支援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老挝人民；有时又想回家种田也好，生活安闲，自由自在，还能为农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若中国将来真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上山打游击等等。就这样，我在这种悲观失望中，时而是无穷地忧虑唉声叹气想回家种田，时而又想入非非，幻想着成为一个抗美援朝的英雄。有时看到东方红的现状，在一些战友们的鼓励下，我也想振作起来，再干一场，为东方红争口气，但一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我也就很快地泄气了。

在北京没事可干，实在闷得慌，因此就决定到外地去玩玩。商量的结果决定去广州、桂林。由于车票不够，蒋良朴等四人就先离京了，我们四人就分头筹车票。过了几天，突然听说学校要开始整风，并且戚本禹同志有一个电话批示，同意对我进行批判，这时我感到在北京呆不住了，就慌慌忙忙地走了。我还想，要是这次整风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回来了，就到越南去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死在战场上算了。比当反革命不知要强多少倍呢！这是我再一次顽固地拒绝中央文革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批判与帮助，再一次坚持自己反动的立场，再一次失去了革命的机会，再一次地与中央文革和广大革命群众相对抗，再一次地与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使我的错误就更加严重化了。

回京后，我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批判会上态度极不老实，报着侥幸过关的心理，

策划成立了《新东方红》，企图通过揪出刘少奇使自己过关，在东方红内部制造分裂，再一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这个企图失败后，又要以极端错误的绝食以示“抗议”，可见我的反动思想、立场顽固到何等的地步！今天回想起来是不胜的沉痛，我愿向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中央文革请罪、向广大的《东方红》革命群众请罪！并决心痛改前非，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中央文革的立场上来，回到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立场上来。

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由于我的错误，对革命事业对《东方红》都带来的极为恶劣的影响。首先我几乎毁了我自己，几乎使自己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成为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同时也影响了《东方红》中一批很好的干部，他们被我带着走上了一条歧路；由于我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使《东方红》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曾流行一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由于我的错误，在今年1-2月份时，使战斗在外地的我《东方红》战士处于一种最困难的境地，使外地的一些造反派组织亦遭到一次攻击，由于我的错误，使《东方红》内部斗争日益激化，严重地影响了《东方红》的战斗能力。虽然中央文革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不至于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到影响，但我确实是在给中央文革的脸上抹黑。

我的态度：我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一直走了很远很远，若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至今我可能还不会回来，原先我总以为那些要揪我的人是要打击报复，是为了出气，今天我才体会到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挽救我。通过前一阶段大家对我的批判、帮助，我开始有所醒悟，对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开始有所认识，现在我还在继续写检查与交待。我决心在大家的帮助下，努力学习主席著作，深入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交待自己的反动言行。力争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希望能在下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作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

来源：<http://www.71.cn/2012/0410/514591.shtml>（文革十年文献库）

## 【读者来信】

## 1. 扬子浪问姜义华文章中的两个引文出处，卜伟华先生解答

贵刊 156 期刊登的姜义华先生的《毛泽东晚年改革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实践》一文，总体来说是一篇十分严谨的高质量论文。但在引述史料时，特别是对首次或较少引用的关键史料，没有附注出处。而且不直接引用，十分让人诧异。如该期 19 页，毛泽东和张春桥，姚文元在 1967 年 1 月 12 日致 18 日的多次谈话。又如该期 25 页，周恩来关于要批评托洛茨基的两次谈话。这两处引用的谈话不但对该文，而且对文革史的研究都非常重要，很不理解作者怎么会没有附注出处，抑或另有隐情。十分希望作者能予以补充或说明。■

因本刊联系不上作者姜义华，特请卜伟华先生解答您的问题。详如下：

一、毛泽东 1967 年 2 月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可见《张春桥、姚文元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7 年 2 月 24 日）。此讲话载于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二、周恩来关于托洛斯基的两次谈话，一次在 1971 年 5 月 31 日，一次是在 1972 年 5 月 21 日，亦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2. 黄肇炎谈丛立新《文革期间北师大的非正常死亡》一文

154 期载《文革时期北师大非正常死亡》一文非常好，收集整理了 45 名师生员工的死难过程，以及他们人生的简要经历。让死者在历史上留下一份必要的记载，不要使亡灵默默无闻地淹没在尘世中。作者花费了很多心血和精力，功莫大焉。

但文中有一点问题，本不想苛责，思量良久，还是指出为好。

蔡钦山条中说：1966 年“6 月 17 日”，在批斗蔡之后，“造反派们还在宿舍的门上装了一块黑板，令他在进出时必须低头弯腰，称之为‘钻狗洞’”。“当头晚上”“蔡自缢

身亡。”（3页）这样的叙述，把蔡死亡的加害者暗指为“造反派”，我以为这不正确。因为事件发生时，北师大的掌权者是工作组，文革造反派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据本期的另一篇《北师大文革大事记》记载，“6月6日”工作组进驻“领导师大文革。”从文革中权力集中的情况看，工作组应该为批斗蔡钦山致死承担主要责任。造反派在文革中只存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不应该把造反派兴起之前其他方造成的过错，也说成是造反派所为。

让造反派提前出场的类似问题，也出现在邵鹤亭条（5页）、高尚年条（6页）和卢志恒条（11页）中。高尚年条和卢志恒条中说：1966年6月22日工作组进驻临汾分校，表态支持造反派，反对保皇派。从文革的发展进程看，工作组初期，有没有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分野？我也有所置疑。这里也涉及到造反派兴起的时间问题。可能是时间久远，资料提供者的记忆发生了混淆。

又，高尚年条中的时间“1966年6月22日清晨”，卞仲耘条中的时间“1985年8月5日下午”明显有误。■

### 3. 蒋健纠 156 期之错

2页上的“即非”应为“既非”；77页上的97条中的“修养”应为“休养”；85页上的两处“156期”应为“155期”；90页上的“至于是那几个历史问题”应为“至于是哪几个历史问题”；92页上的“新帐”应为“新账”。■

### 4. 孙怒涛赞乔晞华《文革暴力、真相与和解》一文

第156期刊登了乔晞华先生的《文革暴力、真相与和解》一文。其中真相与和解部分，我看了很受启发。关于文革，国家层面并没有启动真相与和解，反而是强迫遗忘。民间的，自下而上的做这件事，既困难，成效又甚微。但是不管怎么着，还是得做。能做一点就算一点。揭露真相，留存历史；讲出真相，复明良知，于个人，于社会，都是有益的。■

## 【本刊声明】

##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景 山

本期校对：立 嘉